



# 海地：爆发

我们都是海地人  
沃勒·索因卡

文化，海地复兴的摇篮  
玛丽·洛朗斯·若斯兰·拉塞格

海地的新起点，并非从零开始  
米歇尔·奥力欧

海地传媒界：一个转折点  
罗伯逊·阿尔放斯

海地重建的四大支柱  
阿莱克斯·杜普

街头大学  
杰基·陆马赫克

教科文组织在行动  
莫迪·本池拉

档案：勒内·德佩斯  
雅斯米娜·萨波瓦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2010年9月

# 信使

ISSN 1993-8616

## 多样性

散布于全球的众多神圣地方组成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交流场所。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提升人们对其保护环境和文化角色的认识。

本组织是2010年两个国际年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其主要目标为促进人们的思考，并为保护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和环境行动起来。

[www.cbd.int/2010/welcome](http://www.cbd.int/2010/welcome)

和

**国际文化和睦年。**其主要目标为促进对别国文化的尊重，打破文化间的障碍。

[www.unesco.org/fr/rapprochement-of-cultures](http://www.unesco.org/fr/rapprochement-of-cultures)

2010年6月8日至10日，主题为“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会议在蒙特利尔（加拿大）召开。

欲了解更多情况，请查询：[www.cbd.int/meetings/icbcd](http://www.cbd.int/meetings/icbcd)

阅读：

《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

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提要，2009年

<http://www.unesco.org/tools/fileretrieve/fc7b16e2.pdf>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http://unesdoc.unesco.org/](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29/142919c.pdf)

[images/0014/001429/142919c.pdf](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29/142919c.pdf)

《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1851-EN.pdf)

[src/01851-EN.pdf](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doc/src/01851-EN.pdf)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http://unesdoc.unesco.org/](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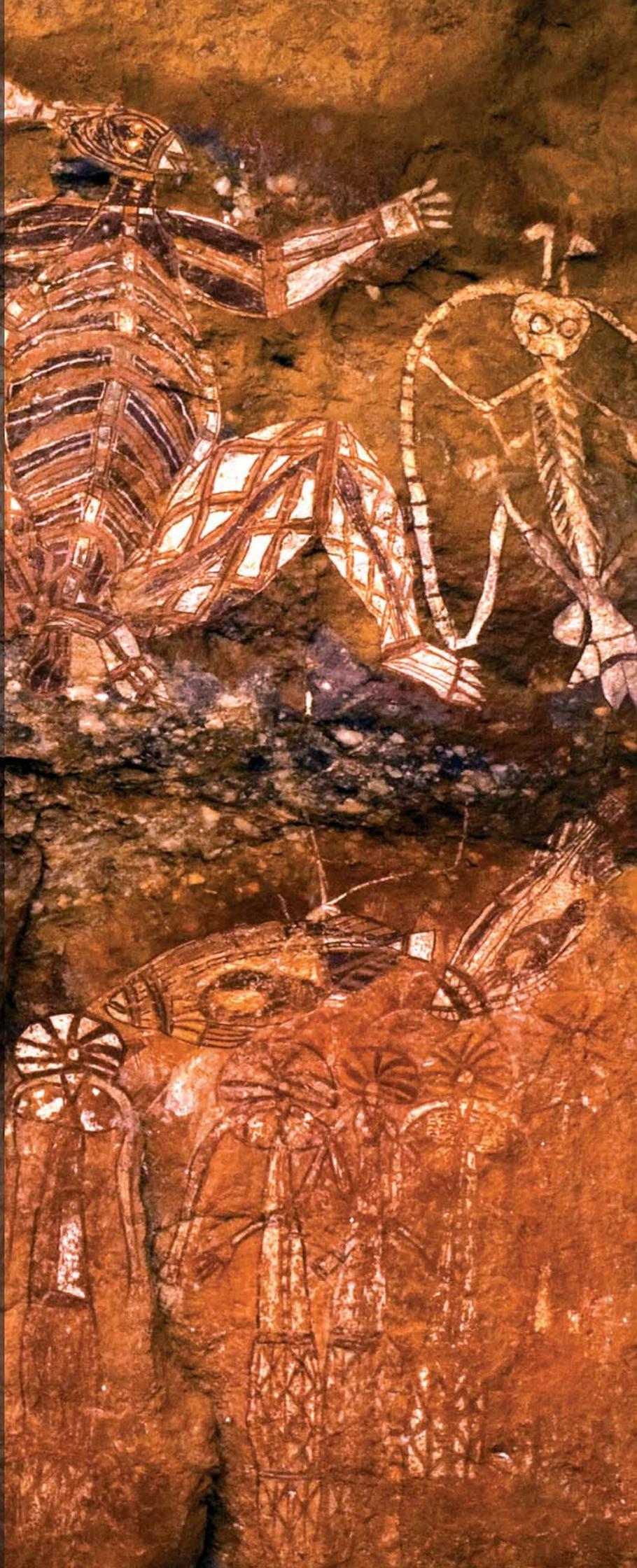
教科文组织其他出版物：

[http://publishing.unesco.org/results.](http://publishing.unesco.org/results.aspx?&theme=3&change=F)

[aspx?&theme=3&change=F](http://publishing.unesco.org/results.aspx?&theme=3&change=F)

安邦画廊的岩洞壁画。这些壁画位于1981年成为世界遗产的卡卡度国家公园（澳大利亚）。卡卡度岩壁艺术讲述着4万年前的历史。

© Our Place the World Heritage Collection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2010年9月

# 信使

《教科文组织信使》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

地址：法国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www.unesco.org/courier

主编：Jasmina Šopova  
j.sopova@unesco.org

编辑：

英文：Cathy Nolan  
阿拉伯文：Bassam Mansour, 助理：Zaina Dufour  
中文：王伟英  
西班牙语：Luisa Futoransky 和 Francisco Vicente-Sandoval  
葡萄牙文：Ana Lúcia Guimarães  
俄文：Katerina Markelova  
实习生：Noémie Antony

图片：Danica Bijeljic 和 Fiona Ryan .  
设计：Baseline Arts Ltd, Oxford  
印刷：UNESCO-CLD  
咨询和复制权：Fiona Ryan  
f.ryan@unesco.org  
+33(0)1 45 68 15 88

可以转载文章，转载时请注明作者、日期和“转载自《教科文组织信使》”字样。

所有文章代表的是作者的意见，并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见。

版权属于教科文组织的图片可以复制，复制时请注明©Unesco和摄影师的名字。如需高分辨率的图片，请和图片库联系：www.photobank@unesco.org

地图的边界线并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联合国对任何国家、领土表示任何看法。

本期《信使》的出版得到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的资助。



国家艺术中心作品，海地太子港。



社论 伊琳娜·博科娃，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5
<b>文章</b>	
我们都是海地人 沃勒·索因卡	8
责任——自由与团结之间的联系 贝尔纳赫·哈加迪	11
文化，海地复兴的摇篮 玛丽·洛朗斯·若斯兰·拉塞格	13
海地的新起点，并非从零开始 米歇尔·奥力欧	15
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 南茜·霍克	19
海地传媒界：一个转折点 罗伯逊·阿尔放斯	23
对更高人性的追求 拉奥尔·佩克	25
海地经济的恶性循环 乔哈尔得·切利	27
文化与发展：硬币的正反面 安东尼·伟杰朗特	29
海地重建的四大支柱 阿莱克斯·杜普	31
街头大学 杰基·陆马赫克接受 《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通讯的采访	34
改革替代重复 让·顾朗杰	36
<b>教科文组织在行动</b> 莫迪·本池拉	
培训为重建带来切实贡献	38
紧急教学计划	39
<b>档案</b>	
坚决支持教科文组织	41
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 勒内·德佩斯接受雅斯米娜·萨波瓦的采访	44
<b>专栏</b>	
观点	
受金融危机之害的教育 萨马·爱萨马莱	47
全民教育：我们不遵守诺言 凯文·沃特金斯	49
<b>人物</b>	
加尼·阿拉尼：书法是人类与字母的纽带 采访者：教科文组织 巴桑·曼苏尔	51
<b>展望</b>	
男女平等——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萨姆·努乔马接受汉斯·德奥维尔和 克莱尔·斯塔克的采访	53



## 引言

恶劣的天气。海地角。📍

海地正超越废墟，清醒地思考着未来的方向。2010年1月12日灾难发生后，从海地人民在本期《信使》中所表达的意见来看，他们并没有沉浸在悲伤哀悼中不能自拔。他们审视过去，分析国家当前状况，并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他们指责了海地缺乏远见，沦为迷信的俘虏或堕入受害者地位的陷阱，但这只是为了其重建清扫障碍。他们与参加了今年3月24日教科文组织举办的“重建海地社会、文化和知识结构”论坛的其他国际专家一起，期待国际社会以比过去更负责任的方式对海地予以援助。最重要的是，海地人民正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在这片曾经播下过暴政和抵抗的种子的土地上。用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勒·索因卡的话来说，海地正在准备重新打基础。海地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建，而且需要智力、情感和道德方面的重建。为此，海地必须依靠教育，尽管它必须推倒重来，以及文化——其生命力之根本。在国际范围，这些领域属于教科文组织的主管领域，我们在灾难发生后立即承诺对海地的重建提供支持。

雅斯米娜·萨波瓦 (Jasmina Šopova)

# 社论

作者：伊琳娜·博科娃

整个国家在治疗创伤。这个国家还没处理完飓风过境的善后事宜，可怕的地震就袭来了。在2010年1月12日，海地陷入了一种令人绝望的状态：无数的生命葬送在断垣瓦砾之下，无数房屋被摧毁，图书馆和博物馆被夷为平地，学校倒塌，新建的基斯克亚大学成为一片废墟，太子港大教堂变成尘埃——这些场景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中心。

年初至今，海地举国哀悼。然而，正如勒内·德佩斯特的《无辜的鸟儿》允许“抚慰的柔情治疗心灵最深的伤口”，“重新学习如何在沉默中歌唱”<sup>1</sup>，在灾后不到两个月，当我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希望已经从灰烬中重生。我希望海地人民知道，他们可以依靠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我们将与海地政府一起研究怎样才是教科文组织提供援助的最好办法。

有时候，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很难找到希望。因此，我们向这满目疮痍的岛屿伸出援手。3月31日在纽约召开的海地国际捐助者会议上，国际社会承诺了100亿美元的中期援款，帮助海地重新站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勒内·普雷瓦尔总统发起了一项呼吁，希望国际援助帮助海

地的教育系统再次运行起来。教科文组织做出响应，提出举办震后建设、应急教育、学校心理和社会辅导等方面的培训班。这些只是我们支持的最初几个项目，主要（项目资金）来自于1月14日——灾难发生两天之后——我们发起的一个筹款活动。

## 以文化为基石

几乎在纽约会议的同时，教科文组织与海地的文化与交流部长一起奠定了海地文化国际协调委员会（国际协委会）的基础。这个想法产生于2月16日，教科文组织总部一次研究海地文化遗产震后状况的国际会议上。

国际协委会由海地的文化与交流部长玛丽·洛朗斯·若斯兰·拉塞格担任主席，宗旨是协调有关海地文化的倡议活动，并动员必要的资源。今年7月，该委员会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份“路线图”。会上提出的建议有：盘点首都太子港和雅克梅勒市提名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鉴定最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排保护档案、书籍和其他文物；以及为发展文化产业收集数据，开发方法技术等。

© Olivier Beyrou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和海地文化与通讯部长玛丽·洛朗斯·若斯兰·拉塞格。太子港，2010年3月。◎

1. 出自《1999的恶劣天气》，著名海地作家勒内·德佩斯特的一首诗。勒内1926年8月29日出生于海地雅克梅勒市，曾任职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



© UNESCO / FW Russell-Rivoallan

有时候，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很难找到希望。因此，我们向这满目疮痍的岛屿伸出援手。

## “文化是 社会从今日 前进至明日 所需的资源”。

Arjun Appadurai,  
印度社会学家

为了确保国际协委会的提议得到执行，我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捐助者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2011年年初举行会议，研究第一批项目建议书。

到目前为止，教科文组织从自己的经常性预算里拨款，为海地文化相关行动已投入约45万美元，其中包括保护该岛屿北部一个国家历史公园的一个项目，这个公园对海地国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一世界遗产地包括城堡、圣苏西宫和拉米尔斯堡垒，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初，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时候。

捐款已经开始陆续汇入，比如韩国的一个佛教机构捐了一笔款子，用于赞助在太子港的难民营建设剧院。我很喜欢这个项目，因为它使用戏剧宣泄情感的效果，在即使最贫瘠的土壤里播下希望的种子。

而且，我相信文化也可作为一种催化剂，为社会增长提供动力，因此我认为社会发展的构想中不能没有文化。这一现实已开始得到认同——文化终于进入了经济和金融的“核心”。作为这一观点的证明，2月18日在太子港推出的联合灾后需求评估方案涵盖了文化。

### 未来的“Poto mitans”（克里奥尔语，意为“支柱”）

地震发生后，教科文组织立即取得了卫星图像，以制定一个详细的海地文化遗产风险评估图。这个与欧洲航天局合作实施的项目，是系列科学倡议之一。显然，首先最紧迫的是处理水的问题。早在今年1月，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IHP）就开始起草一项管理海地水资源的行动计划。从长远来说，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份建议书，目的是创立一所海地科学技术学院

## 新时代催化剂

马里著名作家和人种学家Amadou Hampâté B相信：一个没有诗人、说书人、音乐家、画家、歌手和艺术家的国家必将凄凉灭亡。

海地必不会亡，因为2010年1月12日灾难之后，海地的画家已经重新开始作画，诗人重新开始创作，歌手重新开始作曲，作家重新开始写作，故事又开始传颂四方。

我们曾试图逃避——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善于做的那样——遁入想象的空间，创造出美好的世界。但地震之后，我们改变了。（地震带来的）空白将催化一个新时代。这片空白亟待我们振作精神，运用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建设扎实的未来，苦难的磨砺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意志。

Mimi Barthélémy, 海地说书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0年3月24日



来防治自然灾害，该学院将对自然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设计并实施降低风险的行动计划，提供预防灾害的教育和培训，同时提高公众意识。

确实，公众的意识和获取信息是教科文组织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已经提供了紧急援助，以保护海地的濒危文献遗产。我们还设立了一个移动多媒体单元，使那些受灾害影响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能够学习使用新的通讯工具。我觉得，这一行动不仅会在帮助公众获取信息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还将增进难民营内的社会凝聚力。

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社会科学教育与文化、自然科学及通讯，是恢复和重建海地的支柱（用美丽的克里奥尔语来说，就是“Potosmitans”）。海地（涣散的）社会整体结构必须重新梳理编织才能使其脱胎换骨。而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书写在可疑的、没有过去的“干净石板”上的。历史往往在连续的干扰和狂暴，以及成就和智慧中写就。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3月24日举办了一次海地论坛，召集了作家、记者、政策制定者和国际专家前来与会。在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他们讨论了海地走向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途径。本期《教科文组织信使》特刊是对这些辩论的一次反映，呈现了文化和教育在该国重建中必须发挥的核心作用。■



### 一个诙谐的时刻，可以为一个人提供几个月的精神食粮

在1月12日的地震中，太子港的人们失去了一切。为了给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带来些许欢乐与安慰的时光，为了帮助他们摆脱焦虑与恐惧，在教科文组织资助下，海地的街头剧团Zhovie为他们进行了演出。4月11日星期天，在海地首都的一个营地里，该剧团为几千名观众进行了话剧《魂灵地（Zombi Lage）》的首演。此处的阿克拉营地收容了约2万人，他们都住在德勒马街道——太子港的一条主干道的临时帐篷和小窝棚里。

“这次演出是为那些地震的受害者，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一次治疗心理创伤的机会”，剧团的一名演员让·约瑟夫如此解释道。约瑟夫在首都的一所中学教哲学。“想帮助他们，仅仅提供食物是不够的。因为人们不仅需要身体健康，也需要精神健康。作为演员，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消除悲观、绝望情绪，并试着给他们带来希望。一份积极的纪念品，一个诙谐的时刻，也许足以为他们提供几个月的精神食粮”，这位老师兼业余演员如此说道。

Zhovie 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街头剧团，有14名演员和3名乐器演奏员。其演出的剧目《魂灵地》，节选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和平艺术家、海地作家法兰科田的作品，其中更加入了一些海地的文化元素。剧中演绎了伏都教所崇拜的神灵，如星期六公爵、死亡之神或者幽灵、生死侍者等。

这支剧团目前深受欢迎，教科文组织计划赞助该剧团到其他灾民营地进行演出。 M.B.

《魂灵地》剧景，阿克拉营地，2010年4月11日。



# 我们都是 海地人

作者：沃勒·索因卡  
(Wole Soyinka)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勒·索因卡宣称：“当一座房子消失，一个记忆库也随之消逝了。”他发起了“恢复海地心灵”的倡议——海地，这个正在遭受政治矛盾和无情自然灾害折磨的国家。

© Jane Therese



© UNESCO/Fernando Brugman

海地革命的象征人物杜桑-卢维图尔在总统府前的雕像。太子港。©

## 这片播下了 暴政和抵抗 种子的土 地，这片浸 染了暴君和 烈士鲜血的 土地，是一 个民族故事 的一部分。

如果说这世上有个时运不济的岛屿，那就是曾经被称为伊斯帕尼奥拉岛、其西半区现名为海地的那个岛。这是一片矛盾重重的土地，同时存在着象征人类精神最高追求的“自由”及其永恒的敌人“独裁”。甚至支撑非洲人民度过几代磨难的非洲精神都没能逃脱向独裁的转化。伏都教变成了一种消极民俗，蜕变成一个迷信和政治恐怖机构，给海地蒙上了一层隐晦的面纱，以邪恶的方式使民众服从，沦为电影艺术取乐的对象。现在看来这被滥用的神秘自然力量已经变成了真实的残忍，参杂了复仇的漩涡，愚弄人们，使人们沉浸在一种状态中——那种直接唤起恐惧感的“僵尸”或者说“活死人”的状态。令人痛苦的是，人们苏醒的过程极其缓慢。

有一句熟悉的非洲谚语说：“一本书丢了，还可以再找一本。而当村里的一位老人逝世，失去的是一整座图书馆。”在充满史官歌手传统以及别的口头方式守护民族遗产的社会，我们可以原谅这种略带夸张的说法。不管怎样，这种观点有其

事实基础。在海地，老人们死去了，年轻人也死去了。消失的还有人们的聚居地。其被破坏的规模可以引出那句非洲谚语的一种变异说法，即：当一座房子消失，一个记忆库也随之消逝了。这是世界的损失，而不只是遭灾地区的损失。

在海地，失去的不仅仅是有形图书馆。的确，我们也失去了那些有形的图书馆，那些记录、那些建筑物，那些守护着一个民族历史的无价档案最终都成为了瓦砾、烂泥和灰烬。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失去的还有那些倍受尊崇的地方和地标性建筑，那些熟悉的院墙上岁月打磨出的光泽，那些公共场所——集市广场、棚架和不知长了多少年的大树。在那些树荫下，史官歌手曾经讲述一个民族先祖们的事迹和社会的形成，在那里，身份的认知从老一代传承下去，年轻一代将其铭刻于心，社会因此获得延续。这些可触摸到的，联接了一代又一代的线索，织就了我们人种的延续。对海地来说，很多这样的线索被大自然不知餍足的深渊埋葬了。甚至让人忆起旧日时光的碎石小路，和纪念历史或胜利或狰狞一面的纪念物和遗迹都未能幸免。不过遗产是超越纪念碑的。这片播下了暴政和抵抗种子的土地，这片浸染了暴君和烈士鲜血的土地，是一个民族故事的一部分，是其雄辩的篇章，是一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注解和书签，即使这个民族在进行最世俗的活动之时也伴随着他们。这些东西被挤压、碾碎，剥夺了其原有的公用属性，变成了一些辨别不出形状的土堆。推土机获得了最后的话语权。那些神圣的传奇地方，连同挖出的泥，成了一场盲目灾难的必定遗产。

海地在德萨林将军领导下抵抗拿破仑沉迷于帝国梦想派出的军队，获得反奴隶制的胜利时，各国文学界，不分种族，曾多么感动，沉醉在庆祝之中！海地检验并击碎了欧洲自称“启蒙时代摇篮”的说法。除了武力冲突之外，海地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最高意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这一事件的英雄们，

如杜桑·卢维图尔，被诗人和剧作家热情地赞美，被热情的雕刻家、画家和织工们塑成雕像、画成油画、制成壁画和挂毯永垂不朽。艺术家们来自世界各地，从哈莱姆(美国纽约市黑人居住区)到南非都有，有的科班出身，是正宗画廊的艺术大师，有的则是笔触“幼稚”的路边画家。这些英雄人物跨越时代而存在，但今天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目前的幸存者，那些光荣历史的直接继承人，纪录那些成就的活字典和我们创作的灵感。

现在，他们的负担是我们的负担，他们的痛苦是我们的痛苦，他们生存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使他们失望，我们是在否定他们，意味着我们承认盲目的大自然击败人类的坚忍不拔、随机应变的努力，我们是在承认自己的失败。我们只有用寄希望于未来的魔杖驱散死亡和痛苦的恶臭，在孤儿、伤员和丧失亲友的人们面颊上予以生命之吻，才算掌握“命运”。

海地唤起了与其面积大小完全不相称的巨大的历史回响，这是一种渴望也是一个警告。海地同时蕴含了黑人种族的辉煌和悲剧。但是，海地人民从未遭遇过如此巨大的挑战以及机遇。海地的存在超越了其象征意义，在其时代它成为了检验人类命运在压迫和自由、霸权和自由的永恒抗争结果的独特所在。海地是一个教训，不仅是非洲世界的教训，而且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教训。大自然予以我们一记残忍的重击，造成几乎无法修复的创伤，首先击中的是各地的非洲人民，从更广泛的涵义来说，它打击了所有珍视自由，理解历史、遗产和记忆是凝聚共存状态经纬线的国际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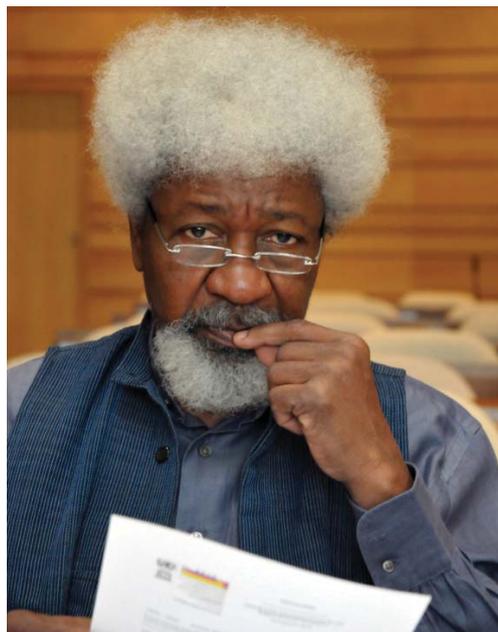
因此，我们不能允许海地消亡、停滞或堕落。有时机会索取高昂的代价，而海地一下子已经付出了几倍的代价！现在该轮到我们来给机遇“挤奶”，来帮助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从道德上、社会上和人才上重建海地。人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对此我们向国际社会的人道响应致敬。但我们不能自满。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海地人——那是我们的同类——现在还在漫无方向地游荡，与犬类和啮齿类动物们一起觅食，蜷伏在简陋的遮蔽物下，母亲怀里轻轻抱着未来，饥饿、倦怠，大眼睛

1. 让-雅克·德萨林 (1758年-1806年)，海地革命的领袖，即雅克一世(1804年-1806年)。

2. 杜桑·卢维杜尔 (1743年-1803年)，海地革命的象征人物，圣多明克(海地旧名)的统治者。

**在世界医疗工作者奔赴救助伤员和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们，恢复医院和诊所，运来药物和营养品的同时，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必须联合起来帮助心灵的恢复。**

里充满困惑，无声地向看不见的可能的供养人哀求着。在世界医疗工作者奔赴救助伤员和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们，恢复医院和诊所，运来药物和营养品的同时，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必须联合起来帮助心灵的恢复。图书馆必须重新摆上书籍、画廊重新开张、学校重新开学。作家们可以帮忙捐赠自己和他人的著作，画家捐赠油画，艺术家献出技艺，教师提供各种教学指导。很清楚，海地再也不会成为它原来的样子，那个我们曾经所知的岛屿，太子港再也不会散发出以往动乱年代的颓废气味。但是，我们可以在废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实体，使其成为全面团结的一座灯塔，对人类精神的肯定，和母亲大陆坚强的前哨——在这里从非洲大陆被偷走的孩子们洗刷了被奴隶的公开耻辱，把一座劳工俘虏营转化成了一座反抗的堡垒，实现了自由的愿景。■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沃勒·索因卡(尼日利亚)，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于2010年设立的文化间和平与对话高级小组成员。

作为小说家和剧作家的沃勒·索因卡也是两个剧团的创始人：1960面罩剧院和Orisun 剧院。

他现在是尼日利亚奥巴费米阿沃洛沃大学的比较文学名誉教授、内华达大学黑山研究所的名誉成员，洛杉矶(美国)罗耀拉玛丽蒙大学常驻教授。



© Leah Gordon: www.leahgordon.co.uk

# 责任—— 自由与团结之间的 联系

作者：贝尔纳赫·哈加迪  
(Bernard Hadjadj)

自从海地于1804年独立以来，它的历史就被一连串的创伤作了标记，创建自由非常困难。强国和国内政治领导人的不负责态度把海地逼进了死胡同。唯一的出路：全世界负责任和团结的行动。

象征奴隶解放的雅克梅勒市狂欢节人物。①

“受攻的、被排斥的、令人垂涎的，受炮舰外交管制的、被分裂的，军事化的，遭受重创的。”这是海地历史学家、外交家丹特·贝勒嘎赫德用来描绘自己国家的词汇，另外他又补充道：“在其整个动荡和混乱的历史进程中，海地的独立不断受到威胁，它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奇迹。”

确实，世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经受了巨大的内外压力，其历史是一个动荡的轨迹。海地被超级大国所排斥，因为它们不能接受这个黑人版拇指汤姆的解放，它面临的是专制政权的统治，这种统治建立在排斥人民的基础上，使这个国家深陷在一贫如洗和绝望的状态之中。

超级大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法国从这个新兴国家撤走了

宝贵的财政资源，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占领海地长达19年。而奴隶制的漫漫长夜也在海地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伤痕。比如，bô lan mèt (那些住在海边的人们)和gwo soulyé (农民)之间的主从关系和严重分歧，尽管奴隶制结束了，两个阶层的分裂依然存在，并且在海地独立两个多世纪后从基础上逐渐破坏其社会结构。

怎样才能真正摆脱奴役？当自由的生机已渐渐磨灭，如何构建自由？自由的构建需要实质内容，使得“自由的试验不会成为无本之木。”希腊出生的法国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这样强调，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这只有当人们设法不使用该种自由做什么的时候才会发生。”

伟大的杜桑·卢维杜尔，及他之后的海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可能赢得了人文主义的基本战役，但就建设新的社会宪章来说，他们似乎是失败的。

## 自由

独立后不久，旧的奴役关系被复制。农民出身的将军们取代了殖民者，而以前的奴隶则依然被束缚在种植园内强迫劳动，他们依然处于无言状态，即被剥夺了所有言论自由、思考及创新的权利。逃奴，这一曾经受到赞颂的抵抗奴役压迫的行为，从(1801年)第一部宪法开始就被定为一种流浪罪，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农业军国主义(caporalisme agraire)一直到1904年——海地独立一个世纪后才取消！为自由而战的农民们，在关于如何终结殖民历史的必要辩论上被排除在核心之外。

考虑到这种主从关系的结构削弱加勒比精神和使家庭结构脱位的程度，这就很容易理解，正是这种主从关系使得海地难以用法律来构建自由。事实上，父亲的位置被主人篡夺之时，其形象就已贬值。这破坏法治规则、具有威胁性的主人形象，是“超越法律”的，是暴力

和混乱的象征，与坚持秩序的父亲形象是相对的。“父亲的话是与法律相符的[.....]而主人的话只是他们自己的回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安德烈在《聚焦加勒比黑人家庭的乱伦》（1987年）中写道。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暴力和心理暴力下，海地的自由度过了其学徒期。但是，要摆脱奴役意味着要克服负面的自我形象，从内在寻找自己真正的解放，而不是重复从种植园继承下来的模式。这意味着找回自尊。

就在几年前，在2004年，海地作家，勒内·德佩斯特，在给同胞卡尔·弗布伦的一封信中提及海地人民仍在遭受的另一种奴役：“让我们废除这一野蛮宗教强加在海地人民可怜的意识上的、内隐的奴隶制，”他写道。“让我们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去重新找回责任感，对抗两个世纪以来因无能而积累在我们僵尸般僵化（体制）上的一行空白。”

## 责任

一个社会根据其安排政治和信仰的方式，可以支持或阻碍其成员的责任意识。政治上，海地的军事独裁者和平民主义极权领导人经常以最高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认为自己拥有神赋的使命。当领导者被认为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人们已无话可说。

同时，新教教会，如海地民族学家查尔斯-普瓦塞·罗曼指出的，鼓励了对不发达现状的超自然解释。“我们能否责怪教会鼓励和宣扬宿命论，培养出放弃者，而不是牧师？”他在海地社会的新教（1986年）写道。但宿命论确实导致了无所作为和旁观者的态度，而不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批评。

其次是扶都教（亦译为巫毒教），其洗头入教仪式是具有象征性的。新加入扶都教的人经过该仪式在头脑中导入罗亚——一种守护天使、一个保护的神灵。据法国人类学家罗杰·巴斯蒂德的说法，这

**对那些认为这篇文章不过是对历史的审视而得出推论的人们，我的答复是：这是对未来放开怀抱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并不是在搜寻过去的残影，因为有人认为过去已经永远消失，而是如法国哲学家埃曼纽·列维纳斯所说的，“复兴记忆中的激进主义，这种记忆，经过时间的推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特殊和普遍之间，将铭刻永久的、增殖性的张力”。** - B.H.

里的头“不是那个人身体的头部，而是他的智能、他的敏感性和他的心理物理生活，简言之，它是与灵魂有关的精神。”如果的确发生了精神的双重化，人们会怀疑到底是谁在指挥这个人的行动。如果构成犯罪，谁是有罪的？

经常听到海地人说：sé pa fòt mwin（这不是我的错），sé pa mwin mêm（那时我不是我自己），sé de m'yé（我被附体了）等等。责任，任何形式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因此而成为一个完全相对的范畴。与正义相关的补偿原则被违反，为逃避惩罚大开方便之门。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两个概念——暴力与逃避惩罚，彻底贯穿着海地的大众心理。

“任何思想改革必须首先承认我们总体的失败，”海地教育家罗杰·佩雷拉，在他的文章《海地即自由的试验》（2001年）中写道。“我们都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可以成为其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团结

此外，虽然责任首先是个人的事，我们必须理解它的含义。根据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的理论，每个人与你发生联系时只能定义自己为我。每一个个人我是我你二元体的一部分，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根据其定义，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如果说人们之间形成团结有先兆的话，这个先兆就是自由，按照阿伦特所指的含义，即融入了政治意义的自由，这个公共空间里“共同生活”是通过对话锻造的。自由只能在社会中实践，体现在对无论亲近还是疏远的他人的关心上，和对全体利益的关切上。

自由与责任不可分割，只能通过团结才能完全表达，没有团结我们将沦为没有灵魂的、法国哲学家让-克劳德·米歇所称的“单子自我”。一个不存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会抹杀人性。

自从海地经历了2010年1月12日地震的这段可怕时期，责任（无论是海地人民的责任，还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团结（海地国家的团结和全世界的团结）这两个中心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知识监督者及思想和伦理价值的传播者，与海地人民一起，需要发挥其作用，在海地有对话的地方，尤其在教育方面，引进责任的原则。这是不仅在物质上重建这个国家，而且在教育和文化基础上重建社会和公民秩序的问题。■



© UNESCO/FW/RUSSEL Rivoallan

Bernard Hadjadj 是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社会经济人力资源经济学博士。他曾花费十年开展社会科学研究，之后加入了法国合作部并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历任驻海地、贝宁和吉布提文化合作行动负责人。他是被收养的非洲裔海地人，他在两本书中通过精心的研究和敏锐的鉴定证明了这一点。这两本书是《全球化的弃儿：边缘化的非洲》（1998年）、《下一年在太子港：走出奴隶制》（2007年）。

André Eugène,  
Grand Rue 雕塑家,  
太子港。

Grand Rue 雕塑家网站: www.artis-rezistans.com - © Leah Gordon - www.leahgordon.co.uk

# 文化，海地复兴的摇篮

作者：玛丽·洛朗斯·若斯兰·拉塞格  
(Marie-Laurence Jocelyn Lassègue)

作为真正的艺术摇篮，海地并没有充分地使用文化资源为发展做出贡献。新的文化行动将采取措施，特别是针对年轻人的措施，提高对创造力的认识，鼓励创造力的载体。

艺术辉煌的寓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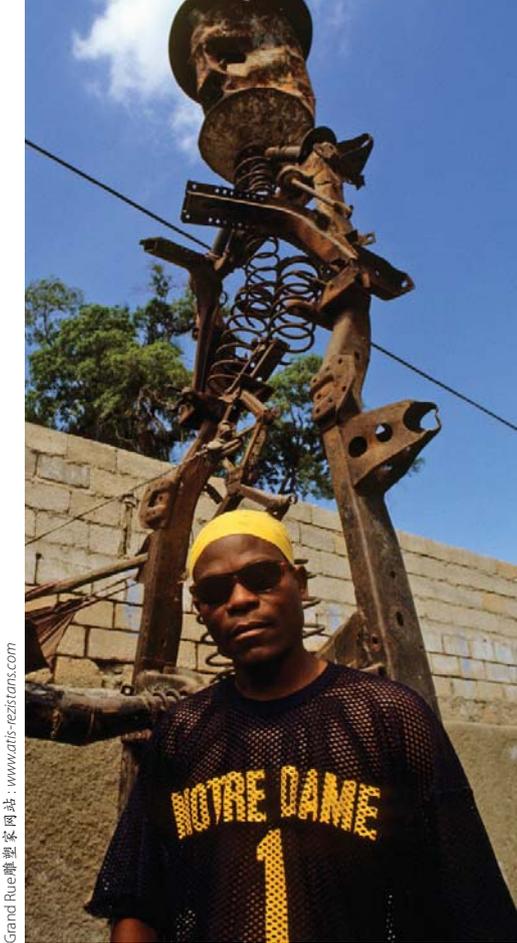


© UN Photo/Marco Dormino

以文化重建海地——这是一个挑战？一种反常现象？还是威胁？”套用一句美国黑人历史学家雷福德·洛根在1804年新的民族国家——海地意想不到地出现后使用的言辞。

这既不是反常现象，也不是威胁，但肯定是一个挑战。因为，在历经200年的风霜雨雪之后——有前进、也有倒退，有时是内因，有时是外因——海地今天的任务，自从2010年1月12日的灾难，堪比一场激烈的重生。而数十万人的死亡和无数房屋的倒塌留下了什么可以作为这一复兴的摇篮？留下的是海地的文化资源。在美国占领海地的鼎盛时期，让·帕海斯·马赫斯医生，以家长式的、但受欢迎的热情，在他的划时代的书——1928年出版的《Ainsi parla l' Oncle》（《叔叔如是说》，1983年翻译成英文）中提醒我们，正是这些资源让我们的国家充满活力，使之继续存在。

是时候重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民的幸福了，是时候认识到文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了。文化并非只有精英阶层可接近的一种附属品或奢侈品，而



Grand Rue 雕塑家网站: www.grand-rue.com

© Leah Gordon

雕塑家，在其作品前。太子港。©

**因此，有必要为海地人民创造合适的条件，使他们接受他们是谁，并持续更新和丰富他们的传统。**

是与经济并行的，把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经纬线，给社会以力量，帮助促进人民的福祉。

## 文化行动计划

我——海地文化和通讯部长——坚信，文化可以在海地重建和转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我呼吁在国家重建与发展行动计划中整合四个主题——加强体制，发展经济，身份、公民权和社会凝聚力，以及地区一体化和国际合作。

加强体制意味着各部委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协议，以期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尊重既定发展场所的具体的文化遗产特色。

我知道，文化及创意产业可以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重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她计划成立一个“创造力基金”，旨在支持艺术家、手工艺者和文化产业，并建立一个有利于专业培训和促进文化企业精神的机制，最终目标是把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社会凝聚力所需的身份和公民意识只有在知识和技能受到尊重，并代代相传的时候才会出现。因此，有必要为海地人民创造合适的条件，使他们接受他们是谁，并持续更新和丰富他们的传统。海地文化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玛丽·洛朗斯·若斯兰·拉塞格是一个激进女权主义者，2009年11月被任命为海地文化和通讯部部长，在1991年至1993年间已担任过该职位，此前曾从事教师和记者职业。2006年至2009年11月，她是海地妇女事务和妇女权利部部长。

的力量汲取自其（艺术，戏剧，舞蹈，音乐等方面的）创造力。这意味着需要采取措施，特别是针对年轻人的措施，并与教育部合作，提高对创造力的认识，鼓励创造力的载体。

海地的创造力是造成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原因，这是世界，特别是加勒比地区都公认的。经过不断的交流，海地文化在该地区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例子很多。今天，这种交流需要给予额外的动力，有计划地实行政策，利用文化进行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舞台海地文化的存在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的海外形象，同时，让我们散居各地的同胞，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和潜在投资者安心。

## 海地文化观测台

为了鼓励公众参与文化活动的连贯性，文化部打算召集国内国际的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和决策者一起召开海地全国文化论坛。这次论坛将提供一次聚会的机会，并满足和确定主要优先事项和行动路线。该计划将受到一系列与教科文组织合作制定的指标、数据和统计数字的监测和评估。

鉴于文化部的责权性质，它可以发挥其在支持海地革新和重建的漫长道路，特别是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的领导作用。我相信，海地文化观测台项目，这一我们特别赞同的项目，将成为发挥这个作用的理想的、可持续的工具。■

# 海地的新起点， 并非从零开始

泛灵论、扶都教和其它基督教基要主义阻止众多的海地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迷信的影响下，海地陷入受害者心理的陷阱。只有通过过去和目前形势的理智分析，海地才能重新站立起来。

作者：  
米歇尔·奥力欧  
(Michèle Oriol)



1月12日太子港，第二波地震结束后，我不安地等待着第三波的来临。正在这时，我听到了叫喊声。从德斯扑莱和帕考山坡传来的喊声。在Bas Peu de Chose区每条街道上都有人在哭喊：耶稣！耶稣！圣母玛利亚！哈米吉多顿！

接下来的三天夜里，所有这些人挤满街头以避免埋葬了他们所爱之人的断壁残垣，向耶稣祈祷、吟唱祷告、朗读圣经。启示录第6章：“我看到第六印被揭开，此时发生了剧烈地震。……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启示录第16章：

这对重新白手起家的海地夫妻已经在他们的临时避难所前种了些树。🌱

© UN Photo/Sophia Paris

“他们本是魔鬼之灵，施行奇事，来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把众王聚集在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利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所发生的事被人们解读为一个征兆：教堂的坍塌，国会宫殿的焚毁，是因为（海地的）政客们不配上帝的眷顾。启示录第18章第9节及第10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她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她的烟，就必为她哭泣哀号。因怕她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惩罚就来到了。”

我看到人们用双手把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或邻居从废墟中扒出。我看到推土机铲起尸首，倒进废料桶，埋到废石堆那挖出的乱葬岗里。我看到前往Pétion-Ville和Kenscoff山坡的人们蜿蜒成了一条延绵不绝的长龙，低洼地区只有趁火打劫者还在逗留。这个不知所云的goudougoudou（注：海地人给这次地震取的绰号，读音“够抖够抖”）把成千上万的海地人赶出了家园，背井离乡，逃往外省、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或加拿大。启示录第6章第15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从那以后，众口相传，广播电台和电视里，教众聚会上，无不是获得灵感的人在鼓吹一个25年周期的终结，终点就是

## 一个永远的受害者不会把自己视为命运的主人。

为了欢迎约翰一保罗二世教皇，妇女们在重画过的基督像前祈祷。太子港大教堂，1982年。☺

在1755年地震中被毁、并以毁坏原状保存着的里斯本Carmo教堂（上）与今日的太子港大教堂（下）令人惊讶地相似。☺☺

看，你的同胞的残骸和灰烬；  
妇女和婴孩堆积的尸首，  
这些散置在断垣底下的尸首；  
十万个不幸者为大地所吞噬，  
流血、被撕裂而仍活着，  
被埋葬在屋顶下，无助地结束，  
在痛苦中，他们悲惨的日子！  
对他们奄奄一息的呻吟，  
及冒烟的废墟、恐怖的景象，  
难道你要说“这只是上帝在显示遵照意志的永恒的法律？”

难道你，在这堆无辜的牺牲者之前，要说：  
“这是上帝的报复，他们的死偿还了他们的罪恶？”  
什么样的罪孽，什么样的过失，  
使得孩子在母亲的胸脯上倒下和流血？  
难道里斯本的罪孽会比巴黎、伦敦或阳光照耀的马德里更为深重吗？

咏里斯本灾难——  
伏尔泰

© Charles Carrié





2011年海地的彻底毁灭。启示录第第11章第14节：“第二个灾祸过去了。看哪，第三个灾祸快要到了！”

我们的国度现在充满深刻的恐惧，这种恐惧回响在整个社会，有待解释。

在（地震发生的）八天里，我在街上没有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人。没看到任何海地警察，也没看到任何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士兵。四周之后国家元首才向全国致辞。这个国家似乎已经随着其权威象征的建筑物一起垮掉了。甚至现在，我们仍然在等待也许永远不会来到的决定和指令。

© Jasmina Sopova



© UN Photo/Marco Dormino



## 让我们穿越历史到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

1755年11月1日上午9点40分，那天正是天主教的万圣节，一场可怕的地震袭击了里斯本，在短短几分钟内造成了彻底的破坏。然后，一场巨大的海啸吞没了城市中心。接着，逃过海浪一劫的事物被火焰所吞噬。四分之一的人失去了生命，绝大部分建筑物都被摧毁。在皇宫的废墟下，倒灌进来的海水形成了一个水墓，埋葬了国家图书馆的七万本书籍和无价档案。

我们得知，当时的首相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安·德·梅罗，非常务实的一个人，只是这么说：“现在怎么办？——葬死者，哺生者。”接着，他立即调遣军队救火和收集尸首、吊死趁火打劫者并示众警告、阻止体格健全的居民离开城市……不到一年的时间，城市清理完毕，开始重建。

这场灾难震动了整个欧洲，甚至影响了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人性在宇宙中感到孤独。说到天意，大家就会想起里斯本。

## 2010年的这次地震将会怎样改变海地人的思维方式呢？

对一个信仰泛灵论的社会来说，地震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某种蓄意干扰的结果。在新教原教旨主义教会的环境里，经过扶都教信徒和天主教徒的整合，圣经

## 我们大力诅咒我们的祖先是在试着用一层清教徒式的面纱遮盖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

引言只能加剧人们的精神创伤。这种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些思考海地民族的人应该考虑这一点。

海地被认为是北半球最穷的国家，现在它认为自己是“最不幸的”，甚至受诅咒的国家。一直以来，我们的领导人，以及许多海地和外国知识分子不停地塑造海地的受害者形象。目前受害者形象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陷阱”。在制度非常脆弱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自国际的善意和慷慨可能会削弱我们照顾自己的能力。我们必须丢开受害者形象，重新树立我们的自尊。一个永远的受害者不会把自己视为命运的主人。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海地制度的逐渐沉沦，经济陷入重重困境，内战的幽灵萦绕不去，国家失去主权——这有外国军队干扰的责任，也有不协调的国际援助的责任，这些都加剧了我们的身份危机。我们如此专注于过去，以至对当前如此困惑，而未来似乎是一个死胡同。

但我们从过去继承到了什么？杜桑·卢维杜尔和让-雅克·德萨林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人物。这两个曾经的奴隶、半文盲，领导海地获得了独立，建立了共和制，成立了国家。但同时我们的历史也经常奏出不谐的副歌：200年来，所有的海地元首都是暴君和谋杀者，专制而腐败；200年来，国家管理一片混乱，200年来，这个国家因内战和社会不平等而四分五裂。

### 尝试再次从头开始

对过去的诋毁于未来无益。而且这种做法并没有好处：这样，那些当权者以及支持他们的国际社会逃脱了惩罚。我们大力诅咒我们的祖先是在试着用一层清教徒式的面纱遮盖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如：人口增长超出经济所能承担的速度，这一点被政治所忽视；小农经济的毁灭而导致非人性化的城市化；外国武装力量的存在对海地的影响被忽略；以及大量木材出口造成的生态灾难，对此木材出口公司应负主要责任。

首都太子港变成了一个拥有两百多万居民的怪物。其人口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每隔十年增长一倍。而在1990年至2000年这十年之间增长了三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太子港62%的住房建于1995年与2000年间。

换句话说，在这次地震中夺走20多万人生命的（倒塌的）太子港的房屋并不是我们的祖先建造的。应该对这些房屋负责的是海地当前的政客们，以及过去16年里和我们的领导者共享权势的不计其数的外国援助使团。

与其谴责过去，还不如来研究最近的历史和当前的情况。自从1994年美国人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来到海地，政局变得（充其量来说）不明确：我们既不是托管状态，也并非完全独立。靠吊盐水式资助的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无底深渊。因此，关于政权的问题不容回避，因为这是重建的中心问题。

重建海地政府的愿望似乎意味着再次白手起家。海地作为国家已经存在206年。（对海地来说，）不是重建的问题，相反，而是创建过去与现在的链接，重新结合历史，考虑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这才是使海地人民回归生命意义，找回尊严和自尊的方法。■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Michèle ORIOL是海地的一位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她是太子港肖像学和纪录片研究基金会的创立者之一。她是世界记忆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世界各地档案和文献保存及传播而发起的国际行动计划）海地国家委员会的成员。

身为多家国内国际机构的独立顾问，她对许多农村发展和环保工程都做出过贡献，还领导着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对海地资产情况进行研究。她在海地国家大学人文科学院讲授家庭社会学。



# 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

人才流失、文化匮乏、社会腐败，不负责任，腐败 - 这些都是海地现实概貌中很重要的方面。现在，我们提出建议，建设一个建立在科学、智力、能力、人文主义和谦虚基础上的新海地。

作者：  
南茜·霍克  
(Nancy Roc)

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海地的社会、文化和知识结构将不可能恢复原样。与人们有时宣称的相反，海地的社会、文化和知识结构并非在2010年1月12日因地震而四分五裂，而是在这不幸之日很久之前就已支离破碎。

20年的民粹主义使海地社会两极分化，阶级鸿沟加深，并且加快了从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政权统治时期就已开始的人

才流失。“海地培养的最合格的劳动力有83%最终移居国外，”世界银行宣称，并指出美国是绝大多数移居国外的专业人士首选的目的地。加拿大是另一个受到喜爱的国家。

1月12日地震之后，这种人才大流失的状况已经有所增加，如果不迅速采取具体的紧急行动，很可能会大大恶化。海地的经济由于其90%的失业率，在地震很久

所有的手势，即使是失望的手势，也有意义，太子港，2010年1月12日。📍

© UN Photo/Marco Dormino



## 海地人在海边。①

以前就已负债累累。我们最好不要在此纠缠于这些数字，避免打自己的耳光。

作为一个国家，海地所有一切都落于人后。世界上的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变成了美洲大陆的底层贱民——这个国家，从未把自身提升至民族国家的地位，而且，如今比以往更依赖国际施舍。这种施舍，而不是用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援助，在过去20年里，不但没有帮助我们的国家立稳脚跟，反而把它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当然，海地人自己应是其社会衰落的第一责任人，但捐助者也应承担各自的一份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下一届政府需要作出明智的选择，求助于海地侨民——他们每年为海地提供的资金达到18亿美元，相较国际社会所提供的5亿美元，是其3倍以上。

自1986年以来历届政府都声称，海地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资产。然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展示这一文化。如果不是我们艺术家和创作者的活力和才华，今天海地文化很有可能已经濒临死亡。在21世纪，海地没有一家名副其实的剧院，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去年8月，海地首都唯一的电影院宣布关闭，严重威胁到海地处

于萌芽状态的电影业的生存。国家剧院和国家艺术学校的建筑物早就破烂不堪，或者被用于某些政治目的，与任何形式的艺术相去甚远。即使海地文化仍然活跃，却根本没有对其加以欣赏的场所。海地文化上的贫困简直让人无地自容：没有剧院和电影院、博物馆不能与其艺术相称、地方出版企业资源匮乏、没有报纸和杂志、没有文化广播电台，没有文化政策，没有真正的艺术学校。这个曾经让马尔罗觉得诱惑不已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 我们没有失去一切

现在到了“重新洗牌”的时间，我们可能并没有失去一切。在3月31日提交给联合国的恢复与发展行动计划中，海地政府第一次承认，文化“因其多年来的边缘化，是导致发展支持方案在几乎所有地区失败的一个因素。”显然，这预示政府正发出明确信号，愿意帮助文化产业在经济上获得可行的、令人羡慕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海地人的第一反应是去指责政府的低效率，很难相信，在海地会没有任何组织、公司或商人对扩

自1986年以来历届政府都声称，海地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资产。然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展示这一文化。如果不是我们艺术家的活力和才华，今天海地文化很有可能已经濒临死亡。

大文化产业的投资感兴趣。去年8月，在《晨报》上发布的题为《一所真正海地剧院的实情》，以及在《国际信使》再版的题为《演出结束了》<sup>1</sup>一文中，我试图吸引海地大众对文化部门的经济潜力加以关注。仅在2007年，文化为加拿大联邦、省级和市级政府金库带来了近250亿美元的税款。这差不多是这三级政府在文化和艺术方面79亿美元投资的3倍以上<sup>2</sup>。但要理解这一理念并努力实现它，我们必须摒弃平庸。我们何时才能看到海地出现（文化上的）具有社会承诺意识和尊严感的，真正的资助者和慈善家？我们何时才能看到白丁企业家的数量减少？为什么几年来海地最大的体育和文化活动总是主要由外国移动电话公司赞助的？关于海地商人的眼光，这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复。

在知识分子方面，海地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个没有民族概念的国家是怎样成为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的？在我们看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座右铭，连同对邻国非常嫉妒的不信任感，可以从海地的历史找到根源，在其历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真正体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海地的掌权人物从来没有为国家的发展或公共利益工作过。因为，首先，他们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文盲群众”，而且他们贪恋权力。另外，海地社会残留的奴隶制的余味没有鼓励任何社会层次生成责任感。“sé pa fot moin”（这不是我的错）这一表达方式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口号。

但是，如果不是海地的原因……显然，必须有人为之负责。在海地人的生活中，请求外国组织出面介入与立即翻脸谴责外国“干涉内政”只差一小步。从海地社会学家拉昂内克·于赫邦（Laënnec Hurbon）以下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海地掌权人物的破产：200年来，“这个国家从未有过明确的公民感。公民的心态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经常被当权政党利用的肤色问题，扩大了这种种族隔离社会的分化，没有帮助海地人对“共同生活”达成共识。而且，由于民粹主义加剧了对知识分子的蔑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被免除。随便举几个例子，丹尼·拉菲黎叶（Dany Lafférière）、法兰科田（Franckétienne）、莱昂内尔·特

鲁约特（Lionel Trouillot）、加里·维克托（Gary Victor）、亚尼克·拉赫斯（Yanick Lahens）、路易-菲利普·德朗贝尔（Louis Philippe Dalembert），这些获得全球成功的名字证明我们的作家能够征服世界。而且，他们中有人曾参加过海地政治团体“184集团”于2004年发起的“新社会契约运动”——旨在“呼吁海地人民接受挑战，克服妨碍海地团结，阻碍海地发展，甚至在今天还导致政治、社会和经济衰退的历史障碍”。但是，一旦该集团的“政治领袖”遗弃了这一运动，他们也转身离开。

### 身份：一个或多个？

根据喀麦隆社会学家阿克塞拉·卡布（Axelle Kabou）的理论，“每一个社会，在最初和最后的分析，都应对其历史负完全责任，没有例外。”因此，我们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提出海地身份的问题。今天，它究竟是什么？海地是否只有唯一的身份，还是其身份如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我们是否可以谈及适用于生活在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迈阿密、波士顿、纽约、巴黎和蒙特利尔各地所有海地人的一个共同的海地出身？怎样才是理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提出不同着手方法的最好的方式？

关于上述问题——这只是海地这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文化和知识结构固有的主要问题，如何利用现有的社会知识和技能来振兴海地？

当然，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刚才概述的背景，我并没有答案。不过，似乎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其中一些正在得到实施。

### 侨民的作用

最近，我在《新闻人报》报社的同事阿莫斯·山希赫（Amos Cincir）写道“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众多的精英外流”。自2000年以来，海地人中每年不少于10000的最合格的劳动力离开该岛。但是，非法移民往往以悲剧告终，每年有1000名想移居国外的非法移民死于公海。那些成功离去的人们成为他们留在海地的家庭的经济支柱。几乎40%的海地家庭依赖侨民的汇款过日子。2008年，家庭汇款达18亿美

为了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今天海地的重建，必须建立在结合了科学、智力、胜任力、人文主义、以及谦逊的基础上。

元，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不幸的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这一收入来源也在减少，2008至2009年至少下降了30%。这种人力与人才的流失相当于第二次地震灾难。因为，那些离开海地人代表着重建这个国家的最大希望。

遗憾的是，这种外流使得海地83%的流亡专业人士的数量更加扩大。所以，显而易见，没有海地侨民积极、持续地参与，海地的复兴或重建是不可能实现的。海地总理让·马科斯·贝勒里维，以及侨务部长埃德温·帕雷松，在今年1月25日蒙特利尔会议，以及3月4日和5日在新海地研究行动小组(GRAHN)组织的，在蒙特利尔大学理工学院举办的“重建海地——2030地平线”研讨会上，明确接受了这一原则。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海地，人们谈到自己在国外的同胞总是保持沉默。共和国宪法不允许双重国籍，这迫使大多数海地的最佳人才，常常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选择其收留国的国籍。即使如此，如果没有侨民，海地早就已经消失了。

### 教科文组织可以支持的项目

为了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今天海地的重建，必须建立在结合了科学、智力、胜任力、人文主义、以及谦逊的基础上。换言之，海地人需要设计和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其首要目标是共同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包括海地侨民和海地所有的社会网络。

“重建海地——2030地平线”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海地以及各地侨民600多名参加者，这清楚地表明，海地的男男女女能够运用参与者角度的意见、以及岛内外现有的专业知识和敏感性，向重建海地的相关机构提出具体的建议。

这个历史性的会议提出了约45个初步建议<sup>3</sup>。

一些教育项目已经在进行，其中包括：为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海地侨民和海地的朋友们建造一幢永久性建筑物；从长远考虑，建立一套远程教育体系，以便今后转变为覆盖全国的函授或远程教育大学；在海地侨民担任高级职位的企业设立海地学生实习项目；建立海外侨民技术交流网络，进行知识转让和经济发展。

关于文化，除了其他倡议之外，GRAHN还建议成立一个基金——为保护文物和在全国各地发展文化企业而服务，并且发起一项活动——利用新技术进行文化传播的巡回展览。

这是教科文组织可以支持的一些项目。同时，我希望作为海地艺术家和青年的发言人，请求教科文组织帮助我的国家寻找资助海地建设一所真正的多用途剧院的合作伙伴。

最后，不言而喻，一个新的海地必须在各层次完全摆脱腐败的恶魔。让我们不要忘记法国记者艾德维·普勒纳尔(Edwy Plenel)的话：“一旦暴露，金融腐败可以被打击和制裁。思想的腐败则更隐蔽，更微妙，因此而更具内在危险性。”<sup>4</sup>■



© UNESCO / Andrew Wheeler

南茜·霍克(Nancy Roc)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和人权活动家。她是加拿大魁北克记者专业联合会(FPJQ)的成员，并荣获2008年的北南奖。她曾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电台、电视5台工作，并且是成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世界报道记者的第一个海地妇女。

她是1991年至1994年海地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的随员。她返回海地之后被任命为斯马克·米歇尔总理新闻办公室主任，但6个月后辞职，重新成为自由撰稿人。目前，她主要在蒙特利尔主持大都市广播节目。

(<http://www.metropolis.metropolehaiti.com/>)。

1. 请参阅：<http://www.courrierinternational.com/article/2009/09/03/le-spectacle-est-termine>

2. 米歇尔·吉哈德，《文化为政府带来可观回报》，发表于2008年9月24日《新闻报》，蒙特利尔。

3. 如需进一步信息，请参阅GRAHN会议总结：<http://www.haiti-grahn.net/public/?s=194>

4. 艾德维·普勒纳尔，《青年的秘密》，斯托克出版社，2001年。

# 海地传媒界： 一个转折点

海地的媒体有一定的表达自由。但是，为了能够动员社会力量，它应该严肃地看待自己并摆脱粗俗。

根据一家法国机构Médiascom的调查，由于高文盲率，海地94%的人口只拥有一台收音机。但是，调频波段已经处于饱和状态——首都就有40多家广播电台——批准广播频率申请的政府机构已停止颁发许可证。广告收入竞争激烈，“顶级”如大都会电台（Métropole）、愿景2000电台（Vision 2000）、加勒比电台（Caraïbes），Ginen电台，信号电台（Signal）和Kiskeya电台，攫取了大头。其余许多电台，因缺乏必要的经费，广播节目水平实在不高，而且制作人员常常是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士。这些电台只能勉强称为“共鸣板”，其广播内容相当大一部分是指责、轻率之辞、诽谤、和部族纷争等形式的气量狭小的争吵。在过去三年内陆续出现的十几家电视台也差不多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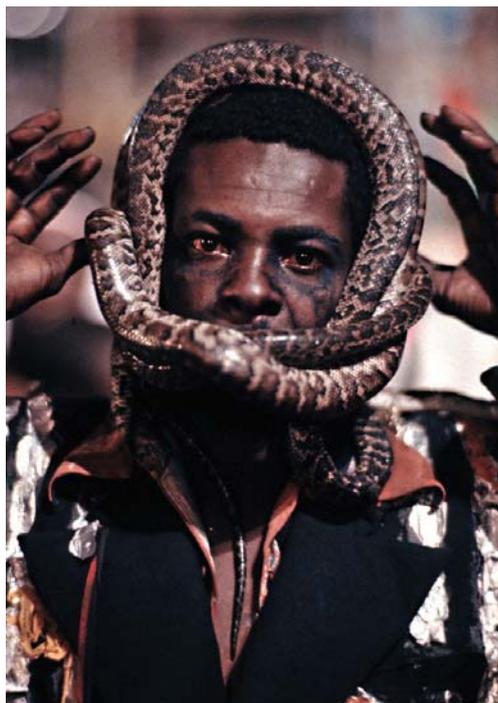
阐述明白、客观严谨的批判性思维是经验丰富的少数记者的特权。海地的两家日报《新闻人报》与《晨报》，均起源于20世纪末期，尽管发行量不大（每期仅两万份），而且首都以外地区投送量极少，它们依然是新闻前线的哨兵。

海地的传媒界尚未在大众心目中形成必要的客观形象，因此还无法把海地人民团结起来。它还不能统率人们应对这个国家面临的众多巨大挑战：地震的威胁、重建家园的紧迫需求、破坏环境的发电方式、教育的困境、经济生产的重整、国家艺术文化的展示。这是海地传媒界在2010年1月12日地震发生之前早就面临的局势。

作者：  
罗伯逊·  
阿尔放斯  
(Roberson  
Alphonse)

**“海地传媒界必须放手一试负责任的自由”。**

批判思想窒息寓意画。太子港狂欢节，1985年2月。©



© Charles Carrière

和其它社会各界一样，地震给海地的传媒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两个月过去了，传媒界大多恢复了生产，但是使用的是与以前相同的节目时间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它已承担起灾难带来的新挑战。不过，《新闻人报》与《晨报》宣称他们将更精确，甚至更激进地报道新闻，而且，还将利用这次灾难带来的机遇做一次“春季大扫除”。

## 批判性思维的扼制

我在这里并不想把我的前任推上审判席。为了我现在享有的，相对较为自由工作的权利，他们中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只是质疑一些人的立场，其中一些观点濒于狂热，加强了现有的分歧，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促进了对传媒界的不信任。



BMC

© Plume

媒体的这一失败有其广泛的社会背景，海地社会已不再要求精益求精、奖励美德或志存高远。海地似乎无法摆脱过去数十年来的倦怠的现状。长期以来政治力量以学习之名免去自身的责任，但他们并没有明智地学习。相反，海地是少数几个知识分裂的国家之一。于此同时，对于科学具有魔幻和宗教色彩的见解造成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对我的许多同胞来说，造成1月12日20万左右灾民死亡的，不是建筑规例被无视的原因，而是因为上帝的降罪！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教堂里挤满了人。神父们称心如意得直搓手。

与此同时，通俗的、以及琐碎的娱乐节目仍然占据着某些电台的主要内容，进口产品的广告也依然泛滥。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有人会告诉你：“那些不是公众爱听的”。就这样，批判性的思维依然被扼制着。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Roberson Alphonse是海地《新闻人报》的记者及Magik 9电台的新闻编辑，兼海地记者协会继续教育委员会主席。

## 重塑传媒界

现在甚至比过去更迫切需要建立信息的模式转变，需要组织起新闻界的“议会”。这个重大的方向变化——从无到有建设现代传媒，即专业的、勇敢的，雄心勃勃的、不受政治权力和金融机构控制的海地新闻界——谈何容易。但必须这样做。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国家、监管机构、独立的媒体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负责任的伙伴关系。

地震之前，两个不同流派的学说，就新闻是否需要法律来规范这一问题，发生了争议。那些赞成立法的人们梦想建立类似法国广播电视高级理事会这样的监管机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在经历了杜瓦利埃的独裁统治之后，把任何引入规范的尝试都视为独裁倾向予以强烈抵制。这种认为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标准或限制的情况下做到一切的信念，对我们海地人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首先海地传媒界要改造自己，然后再尝试动员社会和智力资源。从短期来看，我认为我们需要为新闻工作者设计培训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海地记者协会有着长期的联系，来自他们的支持将再次受到欢迎。教育部、文化与通讯部、记者协会和报纸出版商协会将共同努力，以决定课程。而且，除了培训，我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向职业记者支付像样的工资。今天，一个记者的基本工资是100欧元一个月。

在通讯世界面临的挑战，和其他部门一样，是巨大的。不过，我相信我的国家的未来，新传媒界的未来。我相信，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金融界和政治界的精英阶层会从废墟上崛起。他们会是一个负责的精英阶层，致力于建设一种不同的公民权利，另一种社会意识，为海地一词注入新的含义。海地传媒界，一朝重塑，将发挥其主导作用。借用一个朋友的表达方式，我们必须放手“一试负责的自由”，把知识分子精英和海地政治明确区分开来——换句话说，我们将帮助人民仔细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又一次失败，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做起。

**我相信我的国家的未来，新传媒界的未来。我相信，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金融界和政治界的精英阶层会从废墟上崛起。**

作者：  
拉奥尔·佩克  
(Raoul Peck)

# 对更高 人性的 追求

缺乏远见是海地最严重的问题。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接受着错误方式的援助，但目前的新悲剧也许可以对国家和国际力量发挥催化剂作用。

让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要提什么海地人民被击败了或者他们逆来顺受、无可奈何之类的话。让我们不要把海地定位为一个灾难受害者。世界可以而且必须从最近发生在这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悲剧里，从其漫长的历史中学到一些教训，以便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尝试对海地的彻底改变——（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改变。

什么样的国际背景？经济紧缩以及的更进一步的紧缩；富国负债累累；解除危机的方案令人质疑或干脆没有；富裕社会的极度不平等现象；边缘群体被社会所排斥；失业、破产、自杀、苦难、身份问题——这仅是对未来缺乏选择的一些最突出的症状。

最富有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真正的差别——这差别相当大——就在于，前者具有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结构性资源来改变上述情况。只要前者愿意。缺少的明显是政治意愿，以及一些调动力量的能力。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并不按它应该的样子运作，我们也并不拥有进行彻底变革的钱财。

太子港日常一  
景。2010年1月。

© UN Photo/Marco Dormino





© Leah Gordon

在外国势力的影响下，海地的大米生产在1990年代被毁了。

## 失败的积累

鉴于过去60年不断的失败，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大多数发展政策的失败：原拟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构调整的受挫；联合国斡旋冲突局势的失利；欧洲联盟抵制资本主义金融狂热的败北；主要意识形态集团只关注其霸权的需要和利益；不结盟国家承诺提出可行替代方案解决冷战彻底对立局面流产；国际左翼尤其是社会民主的式微，已无法抗衡全球的失衡，以及最后，我们发展中国家进步左派的失败，其西方盟友为其政治生存自顾不暇而抛弃了他们，以至于被逼至走投无路的境地。

这种失败的积累使我觉得海地真正的出路只能自力更生。我们为什么要再次相信当前这标榜为“援助”海地的意愿？我们为什么要盲目执行那些在万里之外匆匆起草的方案？海地的数家组织和运动指责，海地“重建和发展行动计划”起草的程序几乎完全把海地社会和公民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我加入他们的呼声，公开谴责这种不允许我们积极参与重塑自己国家，“强行军”的行为。

## 扭转当前范式

我们所要求的是多一点谦虚和自我批评。乔纳森·卡茨（美联社记者）在2010年3月20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3月10日，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现在的联合国海地特使——“因倡导了破坏海地大米生产的政策而在本月公开道歉。”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宣称，“那对我们阿肯色州（克林顿先生来自这个州）的一些农民可能有好处，但它没有奏效。那是个错误。”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并不按它应该的样子运作，我们也并不拥有进行彻底变革的钱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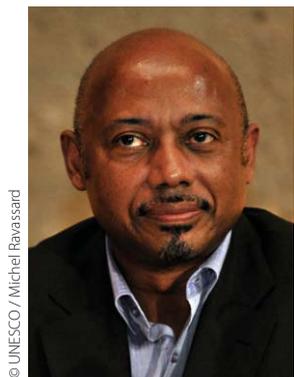
事实上，30年前，海地只需进口19%的食品，并出口大米和咖啡。1986年，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迫于克林顿和国际货币基金（IMF）及其它机构的压力，以结构调整为借口取消了贸易壁垒。今天，根据乔纳森卡茨的文章，阿肯色州 Riceland 食品公司——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大稻米生产商——生产的六磅大米售价为3.80美元，而海地生产的同量大米售价5.12美元。

同时，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太子港之所以有这么多死者要哀悼，正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有资源，没有生产资料，无法与西方进口货物竞争的情况下，被迫迁移到那里寻找工作而造成的。

所有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昨天所谓的解决方法成为了今天的灾难。一人的贫困创造了另一人的财富，反之亦然。我们的命运被共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国际援助并不能提供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更具全球性的观点。

海地目前经历的悲剧和哀悼可以使我们借机扭转目前的模式。海地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调停范例。由于不平等现象的不断加剧，这不仅是南美国家也是西方国家城市的紧迫需求。我们越早开始这一彻底变革的过程，就越早能够携起手来，共同追求更多的人性、正义、平等和——幸福（有何不可？）。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乌托邦式的项目吗？我不那么认为。尽管经历了众多失败，无论个人和集体，人类还是表现出了容纳仁慈，创新和勇气的巨大能力。■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Raoul Peck，海地前文化部部长（任期1995年至1997年）、电影制片人及作家，创作了《岸边的男人》、《卢蒙巴》、《维勒曼案件》、《四月的某时》以及《学校的力量》。他在刚果度过了部分童年，之后去了法国和美国上学。接着，他在德国学习工程和经济，然后进入了柏林电影和电视学院，从此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在太子港（他出生的城市）发生地震的两天前，他被总统任命为位于巴黎的法国国立高等音像业学校（又称Fémis）校长。

在海地，为了建一个房子需要  
节约十年。

© Jocelyne Beroard

# 海地经济的恶性循环

作者：

乔哈尔得·切利  
(Gérald Chéry)

盛行的僵化体系维持着海地过时的经济，使海地陷于贫困，并阻止其发展。与其等待神来帮助，海地人应取消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的资源外租系统。

要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不首先拟订经济政策，或没有一个能对此负责的政府是不可能的。而这两者海地都缺失。经济是进步理念的同义词，而我们也不拥有进步。问题就在这里。海地的普通公民不认为自己是帮助建设国家的工程师。他们等待外部力量来推动进步。对他们来说，繁荣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不允许自己建设国家，改变现实。我们游移不定，不知何方是重建经济的正确道路。我们依然身陷不确定的泥潭，不知所措。

2010年1月12日发生的灾难迫使我们审视自己的僵化。我们再不

能推迟改变原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即严重依赖资源外租收入的经济方式。这种“靠租金度日”的经济方式，依靠少数主要来自咖啡生产的收入来源，只对极少数人有利，绝大多数人并无益处。海地整个政治生活围绕出租资源获得收入，及保护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反对任何多样化尝试的少数当权者这两点展开。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会不择手段占有重要的政治职位。

海地家庭的经济极度困难，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至少省吃俭用十年才能攒下足够的钱开始盖房子，然后用余生设法盖完这所房子。在海地，贷款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该国的整个经济基础是储

蓄，这导致现金抵押（即信贷数额等于借款人储蓄帐户存款金额），其结果是对已获得财富的独特的异常投资行为。

这种情况表明，在海地这个国家，政府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拥有外部租金收入的人们的利益，缺失的是对普通人需求开放的货币政策或信贷系统。这也解释了政府替代品的出现——以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以及……甚至上帝的形式，即一般认为能够照顾人民需要的（团体或个人）。

## 没有信用无法得救

海地如果不采取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方式，将永远无法恢复元



© UN Photo/Logan Abassi

父亲肩负着女儿。他们位于太子港附近“太阳居住区”的家被洪水淹没。

人应呼吁国际机构暂时对海地免除某些规范国际贸易的规则。他们还应该鼓励建筑（钢铁，水泥工程，电气设备等）和住房装修（电器，卫生洁具，装饰用品）相关行业的第一波发展，这些行业过去由于需求不足没有得到推广。重点还应放在培训上，因为只有合格的工人和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个国家才能够还清外债。

为了增加海地的就业，有必要进行其他变革，如权力下放和地方发展；进行社会保障改革，鼓励工人选择在公司就业；进行经济政策改革，释放内部资本；为公-私领域间的合作关系提供便利，刺激工业发展，支持国家介入原来无力管理的经济部门；进行大学改革，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士，为政府提供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管理理念。

气。如果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20万个家庭真的再次购买房屋，他们必须能够获得15年或20年偿还的按揭贷款。而且，由于大多数家庭筹不到法律规定的、房价总数30%的强制性首付款，他们的工作应可以作为贷款的担保。

此外，如果贷款能发放给地震灾民，那么也应该可以提供给每个人。整个信用体系必须全面化，即面向所有人，包括企业——首先应该给企业，使他们能够成长，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使家庭能够偿还贷款。

然后，贷款应根据借款人未来的就业机会，换言之，他们的技能来决定。这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与市场需要相应的培训。信贷和投资的总量将因此依赖于劳动力能力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不是储蓄或外国援助。

信贷经济不是政治领导人或个人的良好意愿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生产组织的基本因素。如果政府没有政策对各经济利益相关者的信誉提供支持，那么它将继续挣扎在一直存在的，同样的困难里。

为了使海地的重建成为可能，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要接受一种关注所有社会群体的需求，而不是只考虑依靠外部租金收入的精英阶层需要的经济运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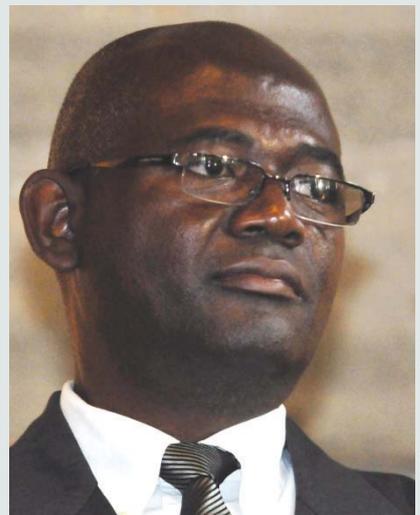
### 贷款和捐赠管理

国际社会所展示的非凡的支持，即对海地的捐赠和贷款，将首先用于重建市区。建筑公司将分享这些资金。而如果该计划能以最低程度的腐败完成，捐助者就会满意。

但是，如果决定大规模进口建筑材料，这一援助对除太子港以外的海地经济的影响，将变得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一旦钱用完了，政府可能得到了办公楼，少数家庭可能拥有了住房，而剩下的其他人却只得自生自灭。“靠租金度日”的经济方式可能会有一段昙花一现的繁荣，而融资生产和就业问题将仍得不到解决。在过去6年对自然灾害的管理不善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发挥外部援助的充分效益，建立新经济的基础，国家领导

**信贷经济不是政治领导人或个人的良好意愿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生产组织的基本因素。**



© UNESCO / Andrew Wheeler

Gérald Chéry, 经济学家、海地国家公共采购委员会成员。



© UNESCO/Fernando Brugman

文化决定论是个危险的大杂烩，它把发展和民主的失败归因于文化特质的内在缺陷。如果要想让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因素，应该去除“文化特征”这一定义的神话色彩。

2010年1月12日地震后的国家艺术中心，太子港。©

作者：

安东尼·伟杰朗特  
(Antonio Vigilante)

# 文化与发展： 硬币的正反两面

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远未得到充分辩论的主题。让我们定义这两个概念。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法籍黎巴嫩作家阿曼·马卢夫说，一个人或一个社区的文化禀赋，是由一个垂直层面——即我们从祖先和传统所继承的那些——和一个横向层面——即我们的时代和同辈——塑成，构成的。那么发展又是怎么回事？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200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提醒我们，发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准和政治自由。文化自由是现在公认的一项人权及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目前文化与发展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文化决定论的浪潮

反复出现，把发展和民主的失败归因于文化特质的内在缺陷。为了反击这种危险的理论，我们应该考虑到文化不是决定我们生活和身份的唯一关键。性别、阶层、职业、政治、人力和物力资源也极为重要。文化在发展，因此一个社会的文化对其未来的发展可能起着非常小的决定作用。总之，我相信关于发展在文化上做不出长篇大论。

**文化和创造力资本应  
通过措施增强人民的社会资本。**

海地人民和艺术家拥有令人敬畏的创造力，他们创作出魔术、诗歌、绘画、音乐，借用玻利维亚作家爱德华·司各特·莫莱诺（Eduardo Scott Moreno）的话来说就是“允许对陌生事物的永恒的探索”。然而，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小说《墓地男爵的女仆》<sup>1</sup>里面一个海地知识分子说，“尽管如此，我看不到社会和政治的前途。”

这明显的矛盾表明，文化本身不一定是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当文化只是被理解为个人的艺术创作和表达的时候。但文化可以是一种潜在的强大利器，如果获得适当的刺激并采取公共政策加以鼓励，可以成为重建海地的一种增强型的社会资本。

## 另一种大灾难

海地代表了挑战发展的完美风暴<sup>2</sup>，存在两大问题：人口的异化和合法运作机构的匮乏。这场风暴的中心是一个合法的、有效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缺失。最近的自然灾害悲剧性地加剧了这种大灾难的后果和海地人民的苦难。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海地需要重建，但更需要的是“重新打基础”。这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在政治领导层、机构能力和社会运动方面没有重大的变革，没有对什么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共识，是很难实现的，在避免其成为一个神话的同时，它需要包容的文化认同和促进性的演变。文化和创造力资本应通过奖励措施和政策的渠道汇聚并增强人民的社会资本，即价值观、制度、信任和互动，以最大程度发挥出国家的发展潜力。

由政府准备的国家发展行动计划指出了一些有希望的途径，如分权管理、区域增长点和文化投资等。可以理解，那些起草这个计划的人们关注人民遭受的苦难，考虑了他们的绝望和（采取行动的）紧迫性。但是，要实现一个愿景，像这个计划这样自上而下的方式是不行的。

因此，重新打基础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能够使用分权管理的方式，使人们真正参与决定地方和国家要务的政治领导层。这样的领导层必须能够制定行政、政治、财政方面的问责制，使海地公民成为参与者，而不只是所谓的“受益者”。

我认为，海地将来的机会在于新的开始，在于定义一个所有公民都能认同的愿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项目，从而使他们的文化和创造力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工具联系生活的各个领域。■

1. 墓地男爵是伏都教的死神，又称十字架男爵和星期六男爵。

2. “完美风暴”是由美国作家塞巴斯蒂安·荣格所著小说，其电影版由德国导演沃尔夫冈·彼得森制作。这个表达方式是指类似“祸不单行”这样各方面因素灾难性地加剧某一局面的情况。

**海地需要重建，但更需要的是“重新打基础”。**



Antonio Vigilante（意大利）是联合国和开发计划署驻比利时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他曾任联合国驻埃及、保加利亚、和玻利维亚协调员兼开发计划署代表，他还曾在纽约，巴巴多斯，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的联合国其它岗位上工作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海地进口食品不超过其需求的10%，当前它进口的食品达到了其需求的60%。国家将责任推卸给非政府组织，后者为海地提供80%的公共服务。错误在哪里？

海地画家Préfète Duffaut的作品。📍



# 海地重建的四大支柱

作者：

阿莱克斯·杜普  
(Alex Dupuy)

早在1月12日7.0级地震袭击海地，将太子港及周边地区夷为平地之前，这个城市已经逐渐走向灾难。1950年，太子港拥有15万人口。198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73.2万，2008年更达到200万和300万之间。但问题是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没有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而相

应扩建，少量的服务设施不是管理不善，就是主要为了城市富人区的需要而提供的。结果只有28%的海地人有医保，54%的人能用上饮用水，以及30%的人享有卫生设施。海地政府早就放弃了其对大多数海地城乡公民所负有的职责，至少从杜瓦利埃年代（1957年）开始就依

靠双边和多边援助国和非政府组织来提供为其民众的服务。在海地经营的非政府组织人均数量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他们提供了海地农村地区70%的医保服务和80%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强化了政府放任主义的习惯，导致海地的基础服务几乎全部私有化经营。遗憾的是向民主制度的转变也没有改变这一根本现实。

（这次地震）最新预计的死亡人数达到25万至30万。泛美开发银行(IDB)估计地震引起的损害和损失将达到80亿至130亿美元，使之成为近现代史册上代价最高的灾难。超过130万人无家可归，目前只有其中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人领到一些紧急避难物资。海地的地质学家几年以来一直在警告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几年前2004年飓风和2008年热带风暴造成大面积破坏和生命损失那样，海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可能发生的地震作准备。由于其短视的做法和总是优先考虑一小撮人利益的政策，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应对如此大规模危机（或者，即便是没那么严重的危机）的能力。和玻利维亚一样，海地的贫富收入差距是美洲最大的。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控制了47%的国民收入，其中2%的人口占有整个国家26%的财富。相比之下，最贫穷的20%的人口只拥有1.1%的国民收入；76%的人口每天的生活用度不到2美元，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用度不到1美元。

但是，当地领导并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力量，这是他们与在海地有长期利益的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主要是那些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法国）及其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泛美开发银行）狼狈为奸造成的。这些机构贯彻了一种双重策略，成功地把海地转变为内外资出口装配行业的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美洲最大的美国食品进口国。这些是通过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政策逐步实现的。这些政策维



© Olivier Beyrou

持了低工资的标准，拆除了所有阻碍自由贸易的障碍，取消了进口税收和进口数量限制，为制造业的盈利和出口提供了税收激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了公共部门的就业，削减了社会开支以减少财政赤字。

同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对食品进口税和数量限制的取消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海地进口食品不超过其需求的10%，当前它进口的食品达到了其需求的60%，同时它需要花费其80%的出口财政收入来支付这笔费用。海地从能自给自足生产稻米、糖、鸡肉和猪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四大稻米进口国，和加勒比海地区美国食物的最大进口国。因此，贸易自由化基本上意味着把海地的财富转移给美国农民和少数几家控制食品进口的海地公司。随着经济的不断衰退，海地越来越依赖于海地移民的国外汇款，2008年汇款收入占海地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双边和多边援助国家受到的关于取消海地外债的压力正逐渐增大。2009年国际金融机构取消了海地12亿美元的外债，但保留了另外12亿美元的外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他们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援助国合作减免海地的债务。尽管这些举措意义重大，但是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机构的整体政策，或者修复这些政策在过去

四十年以来对海地经济造成的损害。

### 海地的命运重新掌握在国际社会手中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新的国会选举原计划在今年二月和三月举行，但现在推迟了。普雷瓦尔总统和新任联合国驻海地特使埃德蒙德·穆莱特再次要求选举尽快举行。本来总统选举也应在11月份举行，但目前不清楚将会安排在何时举行。同时，海地政府发布了与国际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成员联合起草的“海地重建和国家发展行动计划”，亦称“灾后需求评估”(PDNA)计划。这份计划将在3月31日在纽约举办的会议上提交给各国际援助国。该计划估计重建海地需要115亿美元的费用，它规划了海地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愿景，要求把供电、人口和工业从太子港分散出去，并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建筑、旅游、环保、政府服务和农业。

毫无疑问，为了真正重建海地破碎的经济，该计划的许多建议必须包含在内。但是，鉴于海地政府在2008年飓风和热带风暴造成破坏之后根本无法制订重建计划、或采取有效行动的无能表现，特别在这届政府任期将满的当口，这次它是否能有不同表现令人怀疑。事实上，国际社会不得不再次接过拯救

海地角一景。☉

这个国家、打造重建后发展计划的重任，他们坚持创立一个由17位有表决权的成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管理的临时发展机构和多边援助国信托基金，表明他们对海地政府已经失去信心。这17位成员中，8位是来自主要国际援助国和机构（即美国、加拿大、法国、巴西、欧盟、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的代表，1位来自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1位来自其他经济援助机构、7位来自海地。那么很清楚，在所谓海地发展及重建计划上国际社会的代表拥有多数表决权。

而且，PDNA（灾后需求评估）计划所提议的具体工业农业政策含糊其词，老调重弹，不过是国际社会在地震之前早已决定的内容。2009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托原世行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为海地起草发展计划，并任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牵头此事。科利尔的报告与PDNA计划言辞类似，提出了分散投资、建设公路通讯网络、以及在海地不同地区建立集中经营的工业和农业生产等建议。最后那项建议基本上由两条举措组成：在太子港和Ouanaminthe市现有的两个服装生产自由贸易区之外再建立多个服装生产自由贸易区，并发展所选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类似集中经营区。



© Olivier Beyrout

### 全面地重申模式

从我的观点来说，如果说我们希望海地重建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基础上，即优先考虑穷困的大多数人的需求和利益，那就有必要重新考量被海地政府无条件接受，按大国意见制定的，久已存在的现有范例模式。海地城乡草根组织和各行业的民间团体已经开始这样的考量，但他们的意见在官方计划的制订过程中被系统地忽视和边缘化了。这些组织/团体提出的另一种议程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基本要素：

1. 驳回或重新磋商所有由国际金融机构制定的不同版本的结构调整政策。
2. 立即发起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公共工程项目，重建并扩建海地的基础设施、通讯、交通、公立学校、公共保健设施和公共住房。
3. 优先考虑海地的食品安全和主权，补贴供给地方市场的生产活动，推动利用本国自主投入生产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供给国内市场的中小型行业的发展，适当补贴出口产品如手工艺品的出口。
4. 保护所有工人的权益，包括成立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的权利、罢工的权利以及获得能维持生活的工资标准的权利。

显而易见，这些目标不可能立即马上全部实现，但必须有这些作为大规模动员民众的基础来追究政府责任，来重新谈判海地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我也希望：下一次，这个被动员起来的国家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些虚假的先知。■



© UNESCO / Andrew Wheeler

Alex Dupuy 是美国卫斯理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以对海地和加勒比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和政治研究著称。他的主要作品有：《世界经济中的海地：阶级、种族、和自1700年开始的落后》（1989年）；《新世界秩序中的海地：民主革命局限》（1997年）；《先知与权力：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国际社会和海地》（2007年）。

当地领导并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力量，这是他们与在海地有长期利益的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主要是那些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法国）及其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泛美开发银行）狼狈为奸造成的。



# 街头大学

2010年1月12日地震的袭击，造成海地基斯克亚大学完全被毁，但在其废墟上出现了一种基于志愿服务和合作关系的新教育模式。

这一模式由校长杰基·陆马赫克倡导。他接受了《教育信息》让·欧苏里万的采访。以下内容摘自该采访。

地震造成了17名学生和工作人员死亡。震后10天，您组织了一项志愿者制度。您是如何推进的？

首先，医科学生在停车场上搭起了一座帐篷。最初他们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后来一支斯洛伐克医疗队带着药品和设备抵达大学，寻找落脚点，于是医疗队加入了他们，队医们指导他们工作。后来，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流动诊所。接着，又设立了各淡水配送点。工科学生和环境系学生走上街头，帮助人们组织起来，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临时营地，并介绍分区管理、

卫生处理和废物处理等知识。这所大学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志愿服务机器！

后来又搭起了另外11座帐篷。我们给教育系学生办了心理援助课程速成班，他们上完课马上返回街头付诸实践。周末，在其中一座帐篷，他们还举办儿童艺术治疗工作坊，每次邀请150名儿童参与。我对他们说：“现在街头是你们的大学”。

周末，学生们与老师会合，或者总结他们一周所获的非正规教育并使之正规化，或者将理论付诸实践。我们正在制订

《教育信息》  
(EduInfo) 是教科文组织教育部的电子通讯。

一套系统，使他们所作的这些工作能计算学分。这改变了他们的教育模式。他们认识到，继续教育不是单行道，不一定发生在教室里，不一定通过一个无所不知的老师传道授业的方式。通过这种志愿服务，学生从街头学到知识，整个过程由老师伴随。我们正在把知识非制度化。

### 学生们能够继续学习吗？

我们给一座帐篷接上了电缆。称之为“数字帐篷”。在那里我们为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组织与蒙特利尔和巴黎的姊妹大学的视频会议。我们正在考察在线课程，使得快要完成学业的学生能够毕业。

### 下一步做什么？

由于第二学期在1月底开始，我们有400名至500名新学员不能正常开学。现在我们为他们提供15周的通用教育基础打底课程，这一课程结合了基础管理、物流、急救、风险防范、社区组织等短期课程。

最大的挑战是让大学维持运行，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行，我们试着通过设立赞助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捐助者赞助学生每人每月达200美元。这使他们在继续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能满足基本生活开支并且支付学费，从而帮助大学正常运作和进行职员配备。我们迫切需要这种赞助，因为我们是一所私立大学，国家不给拨款。

### 地震是否改变了您对重建海地教育制度需要做什么的看法？

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根据教育系统的损毁状况，我为海地政府重新起草了全国教育合同条约建议。今天，问题不在于让学生“重返学校”，而是让所有海地儿童上学，包括地震发生前不上学的25%的5岁至11岁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广泛征求了具有代表性的家长、教师、学生和非政府教育机构的意见。目前教育预算占海地国内生产总值的9%。我希望到2015年这个数字能上升到25%，2025年能达到30%。我们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的入学率、免费的教育、课本、教材，以及每天为每个孩子提供一顿热餐。要实现这个目标，加速培训师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建议目标远大，要实现它们，我们再不能使用以前的两套不同系统了。■

杰基·陆马赫克（Jacky Lumarque），数学家，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基斯坎比亚大学校长。这所大学由一些大学教授与一些海地企业于1990年合作建成。陆马赫克曾担任金融管理公司Capital Consult负责人，目前担任海地总统教育委员会主席。

基斯坎比亚大学校长杰基·陆马赫克陪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其左）参观被毁的校园。©

**继续教育不是单行道，不一定发生在教室里，不一定通过一个无所不知的老师传道授业的方式。**

“现在街头是你们的大学。”





© Charles Carrié

# 改革 替代重复

作者：  
让·顾朗杰  
(Jean Coulanges)

在纸上，200年来高质量的教育一直是海地的优先事项。但事实上，海地教育原地踏步，并且促成了一个以不平等和不公正为基础的社会。现在我们必须选择新的观念。

自从1801年杜桑·卢维杜尔上台，每一届海地政府，除了亚历山大·佩蒂翁（1806年至1818年）在任期间，都设有一个负责教育的政治行政机构。海地皇帝让-雅克·德萨林签署的1805年宪法把教育列为国家要务。海地国王亨利一世——他以亨利·克里斯托夫国王而更广为人知，他在海地北方成立了一个分裂政府（1807年至1820年），而当时南方处于亚历山大·佩蒂翁的控制之下——在教育上包括高等教育，以及发展艺术和手工艺品方面走在其时代前面。

从1843年到1987年所有的海地宪法都确认了每个海地儿童，不论男女，接受“对所有公民免费的同等”基础教育的权利，这一权利也是他们的首要事项和义务。然而，这个国家从未能够实现这样一种按儿童权利公约规定，遵循基本价值观念的教育系统。而且，早在1月12日地震以前，教育系统就明显需要改革。

海地学校没有引导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却往往维持以不平等和不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一个由没有民族意识的个体组成、很少考虑到同胞感受、排除异己并使之异化的社会。这样的系统已无法根除殖民地统治遗留的缺陷。

海地已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文盲和贫困中一天比一天陷得更深。

## 灾难性的状态

（海地）只有一所大学，少数师范教育机构以及仅有的一所学院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基础和继续教育培训。在六万名教师中，只有10.64%的人具有基本的专业资格。有的老师是从其他专业招募而来，并没有经过具体教学培训。更糟糕的是，有些教师完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即使是合格的教师，由于他们不得不每周担任40多课时，教学效果也有限。

另一影响教育质量的因素是校舍的破旧状况，建筑往往不符合官方规范。

小学教育简直不能称之为免费，因为约82%的学校属于私立学校（根据2003年学校普查结果）。

中学教育自1980年以来即亟待改革，但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人进行过研究。同时，高等教育的改革，1997年以来就停滞不前，其中又以海地国立大学的改革为甚。除了大学生的论文，研究和出版是非常罕见的。

这种情况是怎么来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远见。政府被固步自封、保守迂腐的寡头政治集团操纵着，国家教育获得的预算不多。严重的管理和腐败问题使得事情更复杂化。教育部对教育系统没有真正的控制权，某些项目根本难以启动。

该国的政治动荡也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部长们很少有时间起草，修订和实施适当的国家教育政策。在过去的162年里，海地有过216位教育部长——平均每人任期9.4个月。这种状况造成教育部门延续性的断裂。

## 一个新的观念选择

如何改革这一系统才能不再陷入同样的恶性循环，由于同样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们需要作出新的观念选择，把素质教育作为一个繁荣社会的先决条件。我们要撇除党派政治和吸引选票的考虑，通过改革比如检查制度来建立其它管理机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不偏不倚，以确保海地政府建立全国性教育体系的努力受到尊重。现有的课程也必须调整，使其



© Leah Gordon

更好地适应行业的需求、环境问题和公民价值等。与此同时，必须给高等教育改革分配资源。目前，迫切需要建立足够的基础设施，同时提升教师的职业前景，使他们获得像样的工资。

雅克梅勒狂欢节。①

Bel Air 大众街区的一个孩子渴望上学。太子港，1982年。②

海地的任何教育制度改革必须有利于形成新一代公民及生产者，使得他们能够不断改善海地的物质条件、创造财富，同时推动国家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观的蓬勃发展。新的教育体制必须在教育中纳入海地的现实，必须能够培养出民族意识、责任意识和社区精神。■

**我们需要作出新的观念选择，把素质教育作为一个繁荣社会的先决条件。**

Jean Coulanges 是海地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是个咨询、联络和信息机构，它们调动和协调与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从而有助于实现教科文组织的目标。海地于1946年11月18日加入本组织，是最古老的成员国之一。



© UNESCO / Andrew Wheeler



# 培训为 重建带来 切实贡献

教科文组织  
在行动

作者：莫迪·本池拉  
(Mehdi Benchelah), 法国—阿尔及利亚记者

怎样在建筑上运用抗震方法——这是海地泥瓦匠在教科文组织2010年3月在海地西南地区Camp-Perrin启动的试点项目中学习的内容。该项目将教会500名左右的泥瓦匠抗震建筑工艺。这将在发生地震时帮助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让·斯普忽蒙手握铁锹起劲地工作着。没过几分钟，散乱地放着筛网、混凝土浇筑模具的院子里，水泥、沙子和水就搅拌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形状的混凝土坑。斯普忽蒙向参加抗震方法培训课程的15名建筑工人展示浅灰色膏状的混凝土，用海地克里奥尔语解释：“这样的混凝土就比较好。添加的水量正好，而且材料充分混合。”

让·斯普忽蒙在各位教员中显得很突出。这位比利时籍的项目经理在海地已经生活了44年。1月12日那天，他正在太子港，看到所有建筑物在瞬间崩塌。“这个城市建造的时候，使用的混凝土（材料和比例）完全随意乱来，”他愤怒地说。“我们都看到了这悲惨的结果。”根据斯普忽蒙的说法，“正是倒塌的建筑物造成了人员的死亡。混凝土中含有太多水份，还混入了粘土和砂质粘土，这是造起太子港50%以上的建筑物在震动中倒塌的主要原因。”

为了纠正这些加剧了灾害严重程度的不良习惯，海地西南地区莱凯市附近的Camp-Perrin技术培训中心，与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了针对海地泥瓦匠，扎铁工人和工头，为期10天的一个强化培训课程。“这是一个很好的培训课程，但你不

Carrefour-Feuilles  
街区的清扫。太子  
港。©

# 紧急 教学计划



1月12日的地震夺去了大约38 000名学生和1 300名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的生命。教育部大楼也遭到损毁，太子港地区4 000多所学校，即此处近80%的教育机构都未能逃过厄运。

© UN Photo/Sophie Paris

在因1月12日地震而停课近三个月之后，太子港的学生本周重新回到了学校，但是考虑到学童与老师所经历的梦魇与创伤，教科文组织与海地教育部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教学计划用来取代常规教学。

在3月25日至26日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教科文组织与海地教育与职业培训部设计了一套适用于约60万名公私立学校学生的教学计划。“我们把主要教学目标列为教学重点，”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杰克逊·普雷多表示，“有些知识点我们要求学生在本年度必须掌握，但也有一部分教学内容我们会放到下一年的教学计划中去。”

在分阶段进行的新教学计划中，第一阶段主要是心理恢复的活动，比如唱歌、跳舞以及创意表达等，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学会处理地震给他们所造成的极端的心理压力。他们也将把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学习。正常的教学要到几个星期之后才重新恢复。教育部准备实施为期18周的学期压缩方案，以便学生在8月份就结束这一学年的学习。教科文组织将把新的教学计划放到网上，以便海地所有的老师都可以获得这一教学计划。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学校有能力恢复教学，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学生真正重新回到了课堂。

可能在10天学到关于抗震建筑的所有知识，”中心负责人埃伯特·蒙杜马指出这一点。

米歇尔·拉乌尔，今年40岁，来自Camp Perrin的泥瓦匠，参加本培训课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重犯他们以往的错误。问题往往是由业主造成的。他告诉我们，‘在水泥上保护我的利益’（言下之义是不要花太多钱在水泥上）。但是，这种做法非但没有保护他，反而杀死了他。”

这就是为什么蒙杜马说：“除了传授工艺之外，我们必须让建筑工人认识到，他们在工地工作的时候，承担着职业与道德责任。”

不久之后，第三组建筑工人将开始他们的学习（每期10至15名学员）。该项目将总共培训约500名泥瓦匠，教给他们抗震建筑工艺，这将在发生地震之时帮助拯救许多人的生命。为了培养出最大数量的合格的建筑工人，更有效地传授技能，中心鼓励每组最优秀的学员成为教员。

在培训项目最终，还将出版一本以法语和克里奥尔语书写的，含图表说明解释的书，分发给海地全国各地建筑行业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地方，为了给学生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废墟仍处在清理过程中，帐篷教室正在搭建。图果街区的特雷萨-卢松男女混合学校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况。在一片断壁残垣中，散落着木制长椅、试卷以及黑板，黑板上还保留着地震发生前几小时的最后一节课的板书。

天使圣-玛丽学校受益于初步清理，已经有小块重要的空地供使用。学校的男生校舍已经完全坍塌；而砖式建筑的女生校舍则因为楼表面巨大的裂缝和窟窿同样无法使用。

学校校长弗兰科·伯蒂牧师让人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木棚，在木棚里面用木板隔出了一间间教室。学校本周一复学，但是回到课堂对返校的学生来说并不容易。“孩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伯蒂牧师表示，“有些孩子掉着眼泪，不愿意走进教室，因为他们害怕可能会被埋在里面。”他不得不向学生解释教室是安全的。“早上升旗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哭了，也许是想到了他们的一位去世的亲人、他们的母亲，或者是姐妹，具体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对于教师，这件事都非常难受。”

1月12日的地震夺去了大约38 000名学生和1 300名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的生命。教育部大楼也遭到损毁，太子港地区4 000多所学校，即此处近80%的教育机构都未能逃过厄运。■

## 心理支持

战胜地震创伤，努力恢复对未来的信心：这是海地国家教育部和教科文组织在上个月为来自海地中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举办的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活动的目标。这些行政管理人员将负责对基层教师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

这种“心理”支持以团队建设技巧、角色扮演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为基础，目的是防止并减轻因灾难或暴力事件而造成的心理后遗症。

40名监察人员、校长和教师参加了培训。培训课程还包括震害现象、风险防范和生存技能。

教科文组织在太子港基斯克亚大学的协助下组织了此次培训。这是首次在海地针对在校中学生开展心理培训。

西部省的所有中学生，亦即约11万名青少年将受益于这一心理支持方案。从长远来看，海地全国都将受益于这项计划。

娱乐帮助人们  
战胜创伤。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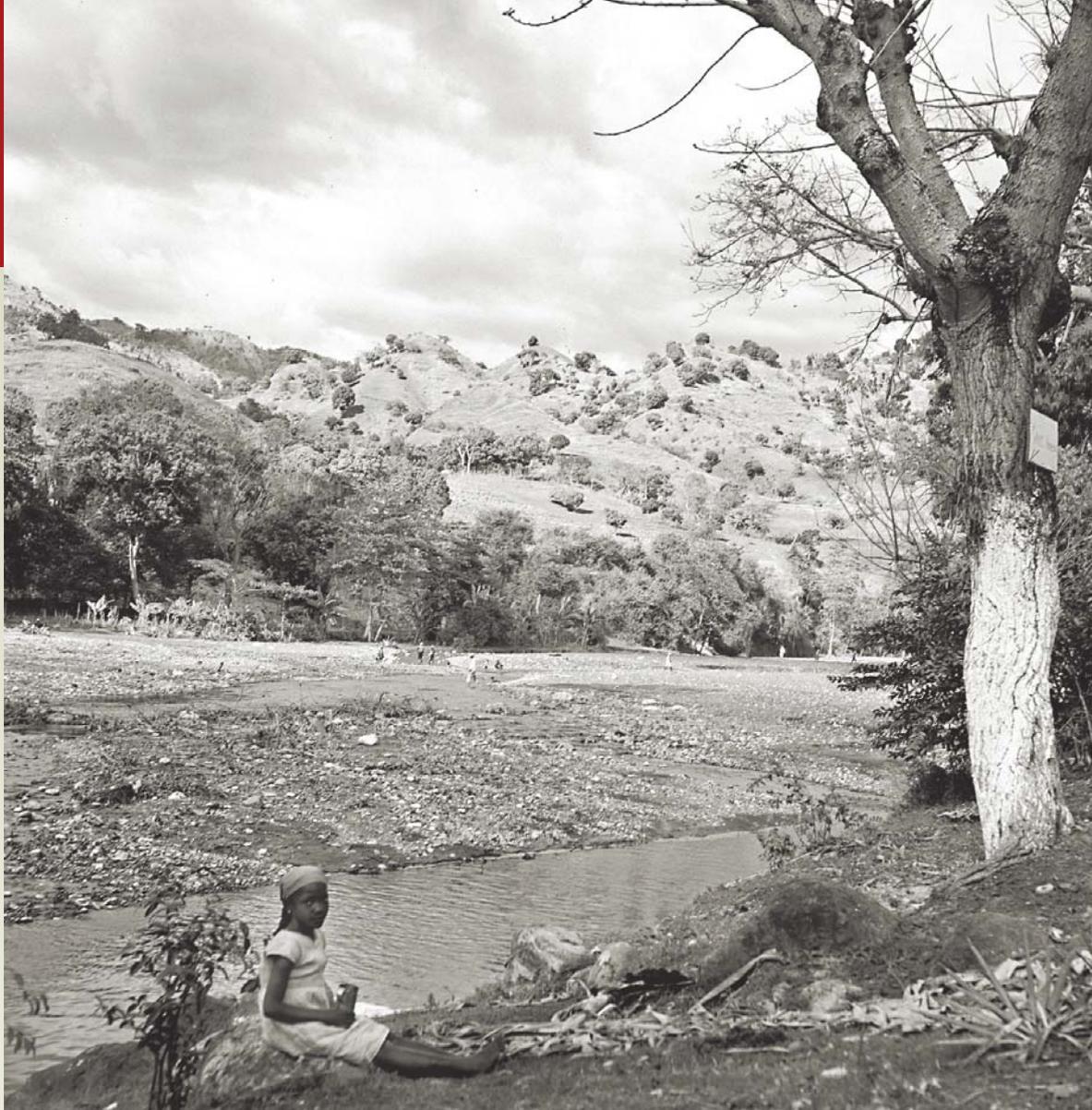
**战胜地震创伤，努力恢复对未来的信心。**

© UN Photo/Sophie Paris

**教科文组织  
在行动**

教科文组织在海地发起的第一个教育试点项目选择了海地南部坐落于 Gosseline 河山谷的玛比尔农村地区。

© UN Photo



# 坚决支持教科文组织！

作者：朱丽娅·波勒（Julia Pohle），来源：教科文组织档案

作为首批会员国之一，海地于1946年11月18日就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之后，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国家发起了其第一个基础教育试点项目。目标是减少文盲。该项目几乎被放弃；当地居民救活了这个项目。

海地成为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成员国之时，文盲率超过80%，有些地区甚至超过90%。这意味着人们不仅不识字、不会写字，也不懂得有关农业、资源保护及卫生的基本科学原理。当时的海地总统，迪马瑟·埃斯蒂梅，建议教科文组织支持海地

推进大众基础教育。朱利安·赫胥黎，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刚刚申明基础教育是“教科文组织致力促成的更广泛、更全面的人文理解”的根本组成部分，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开始了其基础教育试点项目的第一次尝试。



SUPPLEMENT

UNESCO

# LE COURRIER

PUBLICATION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ÉDUCATION, LA SCIENCE ET LA CULTURE

Volume II - No 5

JUN 1948

## Une vallée qui renaît

Voici comment les paysans de Marbial ont contribué au succès de l'expérience d'Haïti

Le village, dans les Caraïbes, en Haïti, une vallée isolée, celle de Marbial, qui s'appelle la Vallée de Marbial, se trouve au nord de la ville de Jacmel sur la route nationale de l'Est, à une distance de 2000 mètres d'origine agricole. Exposée à de terribles sécheresses, elle a été dévastée plusieurs fois par l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notamment en 1908, 1917, 1921, 1925, 1929, 1930,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Le Comité de l'Unesco vous prie de bien vouloir lui adresser vos lettres et autres communications à l'adresse suivante :

山谷人口过多，土壤被严重侵蚀，不识字的农民靠着出产的微薄作物几乎无法生存，许多人饱受疟疾等热带疾病折磨。由于疾病和许多儿童不得不步行两小时上学的现实，山谷拥有的三所学校里只有不到500名注册学生，实际出席率只有其中一半。

除了这些问题，教育上还有一个巨大的语言障碍。虽然海地的官方语言是法语，玛比尔地区的人只说克里奥尔语，而这种语言的教科书不存在，因为当时对克里奥尔语的四种拼写方法到底采取哪一种为准尚未有公论。教师使用的是50年以前的法语教科书，学生不知其义，囫圇吞枣地背诵课文。要解决这个问题，教科文组织邀请了一位曾对美国的克里奥尔语有所研究的美国教授罗伯特·霍尔前来。霍尔博士一抵达海地，就建立了克里奥尔语字母表，使得克里奥尔语基本教材的编写可以继续下去。

1948年4月，教科文组织向海地派出一个调查小组，由瑞士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劳带队。海地政府为新试点项目选择了海地南部坐落于Gosseline河山谷的玛比尔农村地区。该山谷人口估计约为30000农民，分散居住在陡峭悬崖上的孤立棚屋中。调查小组到达之时发现该地区的条件坏到不能再坏。这个

关于玛比尔项目的文章。刊登于1949年6月的《教科文组织信使》。

玛比尔市场一景。

山谷的困难情况和玛比尔农民的无望状况使梅特劳气馁了，他返回教科文组织，呈上了一份非常悲观的报告，认为试点项目的成功希望渺茫。不过，他不同意弗雷德利克·雷克斯的看法，雷克斯是一位美国基础教育专家，他在（调查小组之行）几个月后考察了玛比尔山谷，认定试点项目不可能完成，建议教科文组织放弃该项目。梅特劳博士写信给教科文组织，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撤出海地[...]，我们不能放弃这些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完全打垮他们的精神[...]我们之前在教育领域所做的一切将会崩溃。这将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灾难[...]教科文组织的试点项目，是值得花费我们所有精力的一次实践。”

此时，玛比尔的农民们听到教科文组织可能放弃他们的传言，加入了努力。他们立刻展开行动，立起了巨大的牌子，上书“Kèbé l' Inesko Fò!”——这是克里奥尔语，意思是“坚决支持教科文组织”，表示他们的决心。在短短几个月内，玛比尔合作社把该地区唯一的乡村小径扩成了大道，成立了一个‘教科文组织中心’以及一个社区中心，帮助山谷的人们摆脱孤立局面。农民们挖建了公共厕所和饮用水井，以消除疾病最危险的来源之一。他们在较高的地表干燥处重建了玛比尔集市，搭建起了一个小型露天屠宰场。

此外在教育方面，开始的这几年取得了显著进展：学校引进了学童紧急膳食方案，每周为400名儿童提供一份足量午餐。至1948年9月，创立了10个教育中心，山谷的老老少少学会了用克里奥尔语读写。不久，在合作社几个成员的倡议下，一份手写而成，配以简单插图，只有两页的当地报纸出现了。

尽管有农民们的不懈努力，教科文组织知道自己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教育提高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同时，培训海地教师和工人从而使得该项目尽快能够自力更生。大家很快明白一点——山谷各方面的进步取决于农业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康拉德·奥珀，1950年任命的试点项目主任，要求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也参与玛比尔项目。奥珀先生报告说：“毫无疑问，玛比尔地区的任何基础教育计划，如果没有建立在土壤再

生的基础上，都是不现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也积极参与了该项目，派遣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来到山谷。世卫组织还帮助玛比尔地区建立了一所新医院，从而使得山谷第一次拥有了药房设施。

在这一也许平淡无奇，但稳定向前的发展过程中，奥珀先生及其团队尽可能隐入背景，让该项目的目标人群掌握其进程。事实证明这项政策非常成功，1950年8月玛比尔人民成立了地方领导人区域委员会，为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提供意见。不同联合国机构的共同努力帮助了玛比尔山谷改善其农民的生活条件。但是，试点项目之所以取得成功，要归功于海地人民。■

**Julia Pohle** 在教科文组织档案所工作。  
([www.unesco.org/archives/fre/index.html](http://www.unesco.org/archives/fre/index.html))

玛比尔山谷试点项目只是教科文组织在海地教育、文化、科学和通讯等领域开展的工作例子之一。从教科文组织这一关于其21世纪初（对海地）的贡献的早期文章中可以看出明显的连续性。有关玛比尔山谷项目和教科文组织在海地的工作的原始文件、出版物及信件保存于教科文组织档案中。

联系人：[j.boel@unesco.org](mailto:j.boel@unesco.org)

### 更多信息：

基础教育：在海地的首次尝试。出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4月《新信使》第二期。

蒂博尔·芒德：“被遗忘的山谷”情况好转。出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2年《教科文组织信使》第五期第1页。

海地试点项目：第一阶段，1947至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包括海地政府与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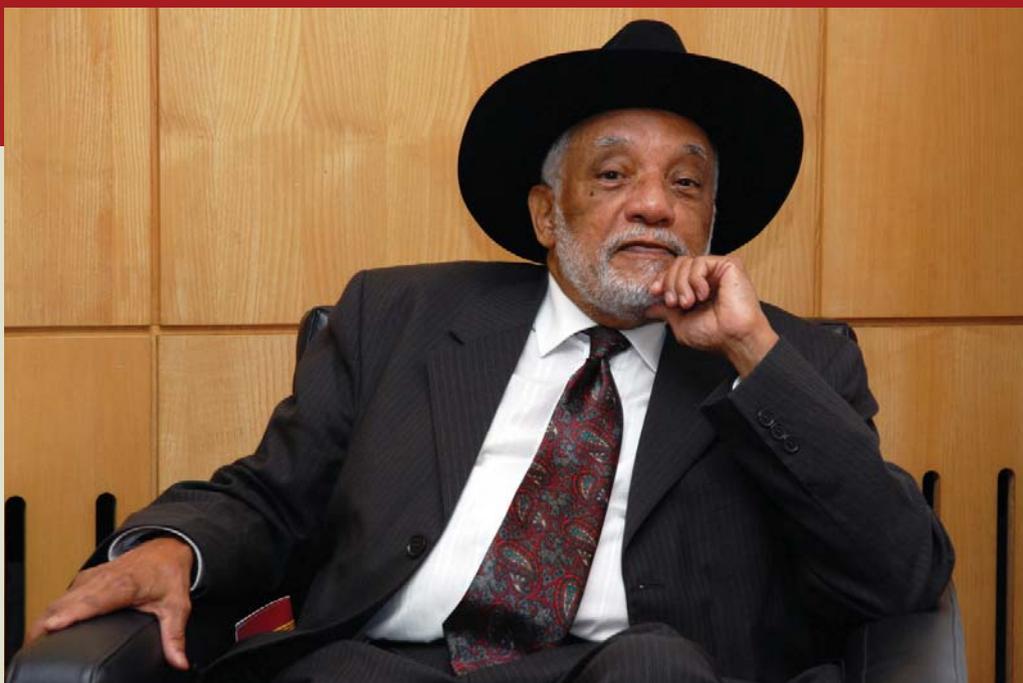
玛比尔山谷的教训。出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教科文组织信使》第三期第12页。

埃曼纽·让-弗朗索瓦：服务经验——见证海地玛比尔的基础教育，教科文组织1950年至1951年月报

海地“试点项目”的故事。出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教科文组织信使》增刊第二期第5页。

一个山谷的重生：玛比尔地区农民是如何鼎力支持，使海地的试点项目获得成功的。出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教科文组织信使》增刊第二期第5页。

勒内·德佩斯在教科文组织，2006年，正值第一届黑人作家和艺术家国际大会五十周年，巴黎。☺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 勒内·德佩斯： 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

在《教科文组织信使》1997年12月出版的这篇采访中，法籍海地作家勒内·德佩斯（René Depestre）与访问他的雅斯米娜·萨波瓦讨论了他的职业生涯。他重申了他对极权主义思想的排斥以及对建立在团结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全球公民权的拥护。

您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诗人的生命开始于您后来称之为“三重叛逆徽章”的三样东西：骄傲的黑人文化传统，充满激情的超现实主义和革命思想。今天，似乎只保留了超现实主义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当安德列·布勒东在1945年底来到海地的时候，正巧那时在举办古巴画家林飞龙的画展和马提尼克诗人艾梅·塞泽尔的系列讲座。这确实激发了我们海地青年艺术家和作家的想象。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法国发生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对反抗埃利·莱斯科总统残暴专政的年轻人而言，超现实主义是反抗的命脉。

与布勒东的接触对我们有传染性的影响。听了他在太子港的一家电影院的第一次讲座之后，我们的新杂志《蜂巢》出版了一期特刊向他致敬。我们的努力让我们进了监狱，杂志被取缔。

布勒东在海地发现的，并且让我们也发现的是：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教条，而且可以是一个民族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的一部分；草根超现实主义确实存在。这恢复了我们的自信。我们认识到，我们私下觉得有点羞耻的，与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神奇感，实际上是我们的武器。布勒东告诉我们，在法国“我们在理智的基础

上推出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海地，你们从摇篮里就了解了关于它的一切。”换句话说，超现实主义是加勒比地区固有的东西。巫毒教，法语非洲融合的一种产物，是宗教超现实主义的例子。巫毒教神明的行为是极其超现实主义的。

**因此，超现实主义对你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运动。**

是的。许多欧洲作家开始于德国的浪漫主义，甚至在此之前就有对超现实主义的尝试。我敢肯定，如果您审视埃及、日本或中国的文化，也会发现其中有超现实元素的存在。一个原因是，超现实主义是在日常生活中注入超自然的东西。

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但是，某些民族如巴西人或海地人，比其他民族更大胆地把它展现出来。

## 您如何解释在一个充满了魔幻感的社会中两代杜瓦利埃的出现？

魔幻甚至在海地政治也留下了痕迹。我们的历史已经推翻那些操纵可悲的、颠倒是非的魔术的独裁者。这是“*tonton macoute*”（注：海地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志愿者组织”），一个民间概念、邪恶的化身、一种纳粹、海地的党卫军人如何开始存在的原因。海地的民间传说，是善恶之间的拔河游戏。老杜瓦利埃，绰号“爸爸医生”，使用巫术的力量，把这个国家投入了极权的超现实主义。但还有比这魔鬼一面的更多的东西。1492年12月的一个早晨，哥伦布发现了海地，他所看到的使他呆若木鸡。自从那一天，海地历史巴洛克式的故事就与美洲奇妙的现实主义不可分割。奇妙感（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已成为海地人对世界的看法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维持所在的三分之一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岛上最好的和最差的，当它们没有锁定在可怕的战斗中时，犹如最亲爱的朋友般并肩存在。

## 您的诗中赞颂了共产主义乌托邦。

在我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带着其所有的谎言和专制恶梦，占据了我作为诗人的作品和生活。我在莫斯科、布拉格、北京、河内和哈瓦那，这些对本世纪的动荡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地方生活过以后，我意识到了在那些地方，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海地的恐怖政权的反面，而是同样颠倒是非的另一种形式。“革命”没有促进人权与公民权利遗产，反而褻渎了人们的自主权，并且，以他们为牺牲代价，进行了人类所有历史上对理想和梦想的最令人拍案惊奇的劫持。

## 那吸引您从海地前往欧洲，之后到了古巴的“革命理想”后来怎样了呢？

我热切地信仰革命。对我来说，革命是我的一种自然状态，就像呼吸、步行或游泳一样。而它几乎摧毁了我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作家的完整性。革命理想使我的诗兴枯竭，耗尽了我的柔情，在我20岁时，那种诗兴和柔情使我认为我今后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与世界和谐统一。由于它，我成为一个在心理和智力上玩翻筋斗，在存在主义问题上突然向后转的作家，我的文学生涯成为一种不确定和矛盾的狂欢，在本世纪的激情和理想的愤怒潮流中漂泊。乌托邦虚构的宝藏岛和革命神话，与我们伟大的团结青年梦想——把改造世界的思想（卡尔·马克思）和改变生活的思想（阿瑟·兰波）联合起来，一起化为泡影。

## 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乌托邦”这个词对您来说有贬义的含义。但您不觉得这个世界需要乌托邦吗？

奥克塔维奥·帕斯把乌托邦定义为“理性的梦想”。我们刚刚从理性的一个可怕恶梦中摆脱出来。十九世纪（如果曾经有一个关键的时代，那就是十九世纪）诞生了革命乌托邦的理念。但是，早期哲学

家完全合情合理的梦想，既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造成人类生活的重大转变，也没有成为人类空前的进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假标签下，批判思想产生的美好愿望强加给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专制。我这样说并不希望贬低乌托邦的理念。这些天，我的年纪提醒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必须赶紧表达我保留了一辈子的东西。并且，我希望，以优雅和成熟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总结我的游牧人生。而所有的自我批评都带领人们走向乌托邦。但是，尽管我已经成了一名冷漠的观察员，我强烈地不赞同“本世纪的革命都是贬值的”这样的历史观念。我提出“*realutopia*”这个概念，代替现实政治——人民和社会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它在政府中仍然异乎寻常地盛行。

## 您能解释一下您所说的“*realutopia*”吗？

这是一个美学概念，它使我能够融合我作为一名法国-海地作家的克里奥尔人特性的不同部分。医生和生理学家把能结合为一个单一功能和一种共同效果的几个因素之间的联系称为协同作用。*Realutopia*的概念使我达到美学和文学的协同作用，将我的众多经验指向一个方向，即魔幻的现



“国家安全志愿者组织”的阅兵。肯斯科夫市，1984年。



© Leah Gordon



© Leah Gordon

参加雅克梅勒市（勒内·德佩斯出生地）狂欢节的男孩。cc

Andre Eugene（格兰街）的作品“Ezili Danto”，太子港。cc

实、黑人文化传统、健康黝黑的性爱以及对海地人的克里奥尔式的幻想，也就是谦卑的和被伤害的人们的超现实主义。

### 那么，您并没有完全丢下黑人文化传统？

我一直不信任黑人文化传统这一说法，因为我认为不可能设立与现有贬低践踏我们“黑人”的学说正好相反的人类学。你不能简单地把依据白人的观点说的话和做的事转移到黑人背景下。艾梅·塞泽尔把这种现象称作是戈宾诺倒置。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没有陷入“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的，我们自己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对黑人文化传统说了再见。我只坚持了超现实主义，这仍然是我的工具之一。我使用同一工具的两端——学术与流行。但我也信任超现实主义了。布勒东倾向了神秘学，试图把超现实主义与某些卡巴拉和塔木德的传统联系起来，这在思想史上是一片阴影区，但同样很有趣——相当于在寻找点金石。我完全不同意这种做法。我已经放弃了我年轻时代的理想，今天我用它们带来的可悲的经验工作。

### 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

革命的思想已被埋葬，历史在媒体灌输的恐怖故事和奇迹的队列中继续前行。灵与肉圆满结合的神话在一张苏联式大床上自然死亡。尸身犹温，而极权主义的火花已经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种族民族主义的各种野蛮行为，打着号称“更新无信念社会运动”的旗帜，正在为蒙昧主义、恐怖主义和新的国家化土匪行为树立纪念碑。在西方世界的边界，原教旨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已经取代了革命性的乌托邦思想。

### 文学怎样才能激励人们走上新的复兴旅程？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原教旨主义的恐怖行为、种族间的大屠杀、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暴力的背景下形成的。这是一个完全由市场力量统治的行星。由于法律和民主法治的理性工具，市场机构经历了所有攻击幸存下来。但大多数人现在认为市场的民主、其基础及其运作方式需要大修。否则，社会生活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赌场。因此，采取行动改变人类事务全球化的混乱、挑衅的状况，符合胜利的市场的利益。应大胆采取步骤，好好利用来自西方国家社会——在法律、自由、正义和团结方面最发达、最有经验的社会——的世界民

## 为了更进一步而不涉 险失败，市场精神现在 应该被赋予某些道德 特点。

主经验遗产、丰富的公民规则资料 and 共同生活的艺术。我们应该能够把当前全球化的杂乱无章的过程变成空前的，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免疫过程。在混乱和不确定中成长起来的国际公民社会需要世界公益意识的氧气和团结的思想，这有利于公平分配地球村现有的共享财产——价值观和原则。

### 谁能够促进这一全球公益意识？

我看到诗人和作家大胆地想象走在世界文化共享的价值观前列。我们的作品，每一件都有它自己严格的美学特征，应该能帮助科学家和政治家们对旧的善恶观进行改造，恢复正在丧失的神圣感，并且制定南半球与北半球、东方和西方更平衡的关系。这将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其中被赋予了新意义和新理想的，必要的商业规则，能够表达自然与历史的新的平衡。为了更进一步而不涉险失败，市场精神现在应该被赋予某些道德特点，例如建立在世界各国人民和社会相互尊重与同情基础上的意义、公民法和共同生活的艺术。■



巴基斯坦青年在劳动。©

困。加剧的贫穷意味着父母能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减少，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孩子被迫失学和成为童工。例如，据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铜矿业失业率的上升已迫使一些家庭的子女辍学。

### 经济减速威胁到教育经费

经济增长对教育经费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府在小学教育方面的支出从2000年到2005年增加了29%。这些增加的经费在该地区的小学教育方面取得的进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经费中大约四分之三可直接归因于经济增长。

因此，日益恶化的经济前景可能伤害到公共教育开支，也就是说，只能建造更少的教室、聘用更少的合格教师，以及造成更多的辍学儿童。

经济减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有地球上将近一半的失学儿童，的教育经费意味着什么？根据危机发生之前及之后的经济增长预测对政府未来的收入水平进行估算，这对洞悉危机的影响提供了契机。一种预测估计，在2009年和2010年教育总开支的潜在损失为每年46亿元。这些数字虽然只是估计，说明经济减速对全球许多国家的预算造成的压力。

富裕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大量投资有助恢复经济增长的项目，保护弱势公民，并维护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常常是其中的优先事项：美国恢复和重建条例预计为教育相关开支提供了1,300亿美元的资金。类似的这些方案已导致许多富裕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不断上升。

与此相反，低收入国家用于应对经济下滑的腾挪空间非常有限。在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税收收入比例可能下降或保持不变，而增加政府举债不可能是一个可行的

## 受金融危机之害的教育

作者：萨马·爱萨马莱 (Samer Al-Samarrai)

经过十年令人鼓舞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贫困的加剧，经济增长的放缓，政府预算压力的增大，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进程被搁置，甚至出现逆转。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避免这一危险。

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袭来之前，许多最贫穷的国家就已经受到来自国际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的压力。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和经济衰退的致命鸡尾酒已经在千百万的弱势群体生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也恶化了经济环境，使得2015年发展目标，包括全民教育的目标的实现进程陷入困境。

日益恶化的营养不良和减少极端贫困的渺茫前景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饥饿损害认知能力的发展，并可能导致教育成就上不可逆

转的损失。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7年及2008年，高涨的食品价格使额外的1.75亿人营养不良。包括危地马拉在内的几个国家都报告了学前和小学适龄儿童营养不良恶化的情况。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家庭的教育开支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孟加拉国，一项调查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贫困家庭削减了教育支出，以应付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

预计到2010年，经济衰退将把另外9千万人民逐渐推向极端贫

选择。对于许多低收入的非洲国家，这意味着求助于国际援助。

## 教育援助也在下降

即使在全球经济下滑之前，教育援助资金最近的发展趋势就已引起关注。虽然教育援助资金在这十年的前半期曾有所增加，最近承诺的援助总量是停滞不前的。据报道，2007年承诺的援助达121亿美元，与2004年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基础教育仍然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领域。虽然承诺的援助在这十年的前半期大幅增加，2004年以来的阶段具有停滞不前并穿插明显下降的特点。按实值计算，2007年报告的43亿美元，与2006年的水平相比，削减了22%，即大约12亿美元。在基础教育方面承诺的援助减少程度远远大于整个教育领域。

金融危机使援助预算压力增大。一些在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捐助国，特别是爱尔兰，2009年宣布的援助预算计划，与快速扩张相反，将会削减22%。然而，其他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已经作出维持或提高援助水平的承诺。

《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预计，在各国预算中提高教育的优先地位，到2015年在世界贫困国家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儿童早期教育，并减少成年文盲人数（一个惊人的数字——全球7.59亿成年人是文盲，即全球成人人口的16%），每年需要160亿美元的承诺援助资金。当前为46个低收入国家提供的基础教育的援助——约27亿美元，还达不到所需要的数额。

虽然这一价格标签上的金额看起来相当大，它只是英国和美国为抢救四大银行而筹集的资金的一小部分——约2%。当然，这些政府指出，保护金融资产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安全是一种投资。但是，对教育的国际援助同理可证，它对减少贫困、共同繁荣和建立更公平的全球化格局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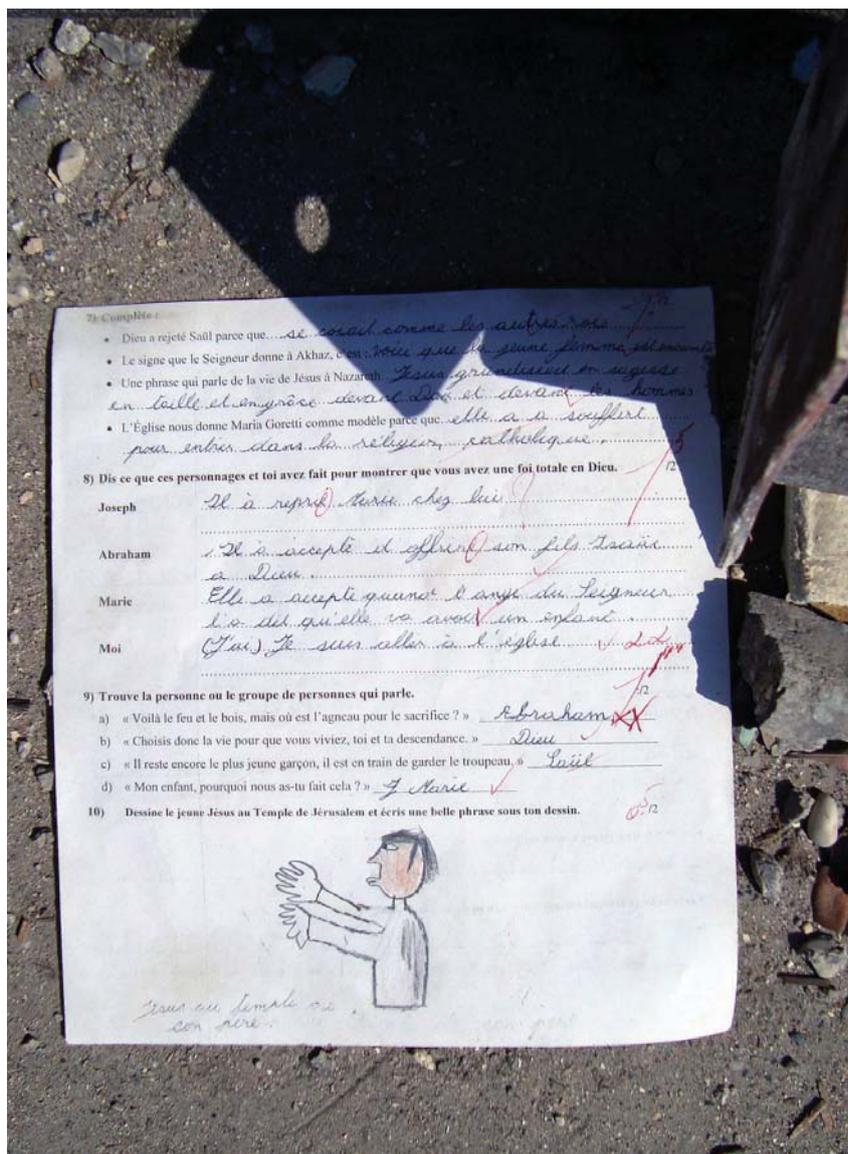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前言中声明的，“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之时，各国政府都迫切需要建立保护贫困和弱势人群的机制。他们还必须抓住时机建设社会，防止社会的不平等，使所有群体都能受益和繁荣。教育是这一战斗的前线。”■

## 日益恶化的营养不良和减少极端贫困的渺茫前景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失去工作时，你会想起你的孩子。孩子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开学时，我还怎么买校服、练习簿还有别的东西？你知道现在的食品有多贵……孩子们依赖我，我是个单身母亲。”

珂妮娅·瓦拉，马那瓜（尼加拉瓜）

萨马·爱萨马莱，教育经济学家，《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主要政策分析家。



显示失败凶兆的教育。①

# 全民教育： 我们不遵守诺言

作者：凯文·沃特金斯（Kevin Watkins）

在2000年达喀尔（塞内加尔）召开的世界教育论坛上，各国承诺在15年内为全世界的儿童提供基础教育。现在距离截止日期还有5年，但仍有7200万学龄儿童得不到基础教育。



© UNESCO / Akhtar Soomro

Karachi（巴基斯坦）一个贫困街区的课堂。①

Begum Hajra学校的学生。时值Karachi市下水道季节性泛滥。②

肯尼亚干旱的东北部一个村校，阿夸拉尔小学的一天早早地拉开了序幕。凌晨5点，当孩子们到达时，他们18岁的老师易卜拉欣·侯赛因已经等候在黑板边上，准备开始上算术课。

在阿夸拉尔，“学校”是一棵金合欢树下的一小块沙地。侯赛因先生的黑板挂在树枝上。没有桌子或椅子。但是，坐在地上大约30名儿童全神贯注地听着，跟着上课进程用树枝在沙地上划写数字。

学校在黎明前上课是有原因的。8点钟，孩子们就要开始做白天的工作了。男孩们随父母放牧山羊和牛群。姑娘们跟母亲到10公里之外的小溪去打水。但是，下午5点他们会再次回到学校上两小时的课。

欢迎来到加里萨的索马里族牧民教育世界。这是肯尼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儿童完成小学教育。只有百分之十的索马里族女孩在少年时代接受过两年以上的教育。

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家长们自己着手解决问题。村民们付给高中毕业生侯赛因先生一小笔钱，请他教导自己的孩子们。他们为孩子们留出上学的时间。对于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女儿法蒂玛7岁，儿子哈桑9岁的海迪彻·阿里来说，这一选择很明白：“当然这很难。但是，教育会给我的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机会，我从未有过的机会。”

要是世界各国政府表现出同样的决心和紧迫感就好了。十年前，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办的全球会议上，他们承诺，确保到2015年世界上所有儿童都得到基础教育。他们没有履行这一承诺。

距离目标日期已经不到5年，看看学校注册登记簿，情况不言自明。世界经济正越来越依赖知识和技能，但是全球有7200万小学适龄儿童没能上学。此外，还有数百万儿童小学没毕业就退学了。而许多小学毕业的孩子没能掌握基本的识字和算术技能——这说明他们所受教育的差劲程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在教育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任何学龄儿童都会告诉你，承诺就是承诺——但如果我们原样继续，将打破我们对全民教育的承诺。今年教科文组织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按照目前的趋势，2015年将仍有5600万失学儿童。

改变这些趋势的努力应处于国际议程的首要位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需要带头落实政策，保证所需投资到位，让最贫困的儿童也能上学。

### 中途的障碍

谈到公共教育，很多时候，那些能从教育获得最大受益的人们总是被排在最后。从马尼拉到内罗

毕，在各国城市贫民窟里，由于没有像样的公立学校，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家庭不得不让孩子去上私立学校，而接受的往往是二流水平的教育，而许多家庭无法支付这笔费用。

推进教育存在的障碍无独有偶。它们与更广泛的问题相连，如贫穷、对女孩和妇女的歧视。在巴基斯坦，贫困农村家庭的女孩平均上学时间只有两年——比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更低。

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需要加大努力提高绩效。捐助国需要信守他们对全世界学龄儿童的诺言。要确保所有儿童获得基础教育，从现在到2015年，每年需要13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然而，经过数年的经济停滞，捐助国去年减少了对基础教育的援助承诺。

这与卫生保健的对比是惊人的。艾滋病与免疫全球基金成为了政治关注的焦点，吸引了大量资金，对有需要的人们的援助不断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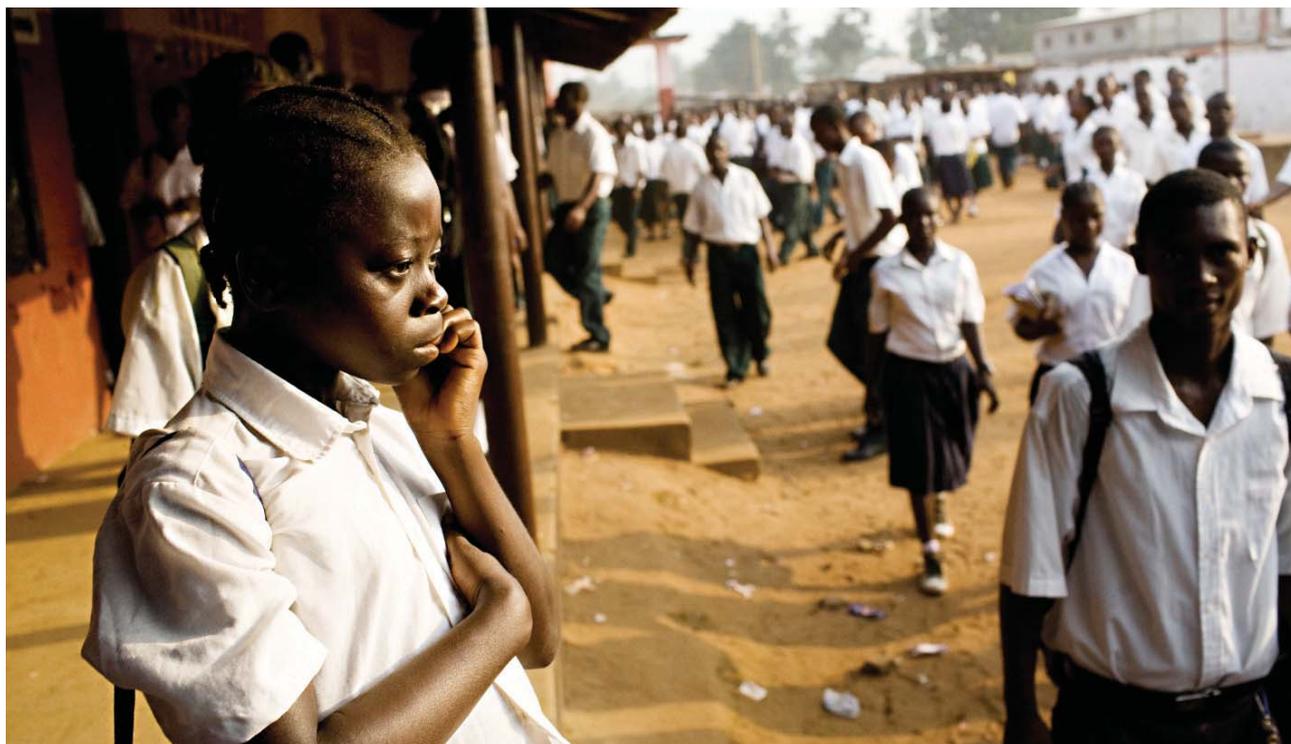
快速通道倡议，一个在世界银行赞助下运作的全球框架，旨在教

育领域发挥类似作用。然而事与愿违，该倡议融资水平低下，程序官僚拖沓，一些国家在获得支持之前需要等待两到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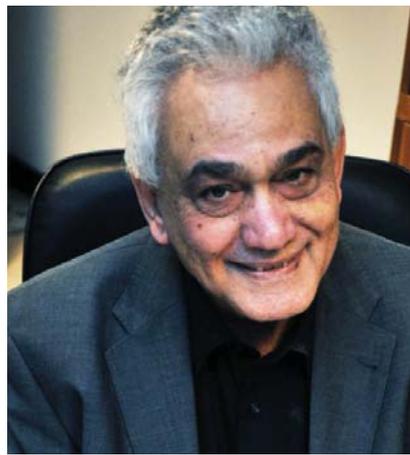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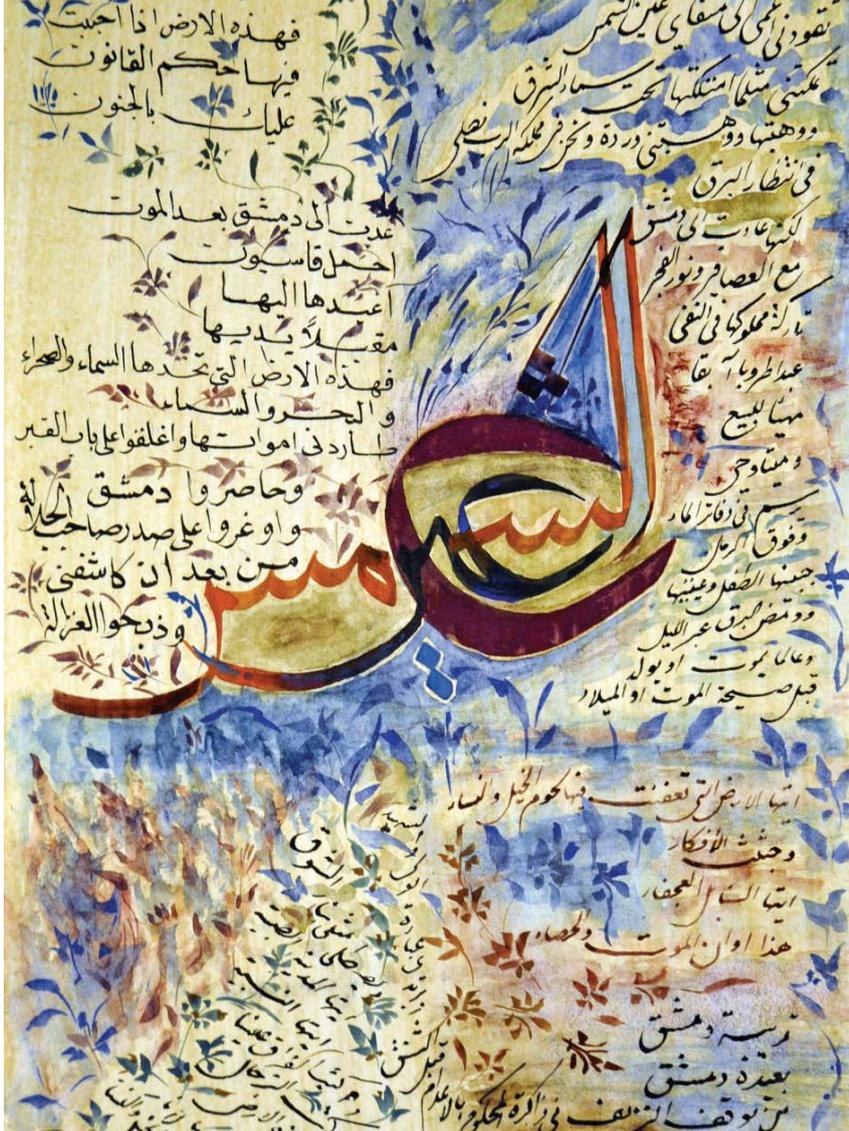
当然，要实现全民教育的承诺，还存在许多障碍，其中包括学校和师资短缺的问题、根深蒂固的偏见、对女孩的歧视、赤贫和不足的教学。但这些障碍可以得到克服——比如，通过更公平的公共开支，对最贫困人群进行支持，以及吸引、培养和留住会教书的师资力量政策。

好学校是消除贫困、与社会偏见和极端主义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它们是对经济增长、共同繁荣和安全的投资。现在各国政府该把教育放在其理所应当的位置，即国家和国际政策议程的核心了。■

凯文·沃特金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月19日出版发布的《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主任。



利比里亚一个学校的操场。①



© UNESCO / Patrick Lagès

“我出生就握起了笔，”他说。“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尝试书法，”他补充道。“在我出生的地区生长着很多芦苇，能用来做笔的那种。”加尼·阿拉尼从小就开始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巴格达的铁路公司上班。白天我清洗车厢，回家以后晚上学习，”他解释说。“每到周五休息日，我整天都会学习、练习书法。”

“我的老师是哈希姆·穆罕默德，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巴格达迪。他师从一位最伟大的书法大师，这位大师的家谱可以追溯至1200年以前的阿巴斯王朝。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13岁。我用三年时间全身心投入对书法的研究。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之后，第二阶段的学习对我来说变得相对轻松。从书写一个字母到书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之后练习书写单词，最后练习书写整句话。”

但是，这位书法大师并不只满足于向他传授怎样用笔写字母，他鼓励阿拉尼解读人与字母之间的联系。“书法中存在着与灵魂息息相关的东西，”他认为。书法家的笔是他的手臂乃至他整个人的延伸。“我的老师从来没有教我如何描写字母。相反，他让我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身体与字母之间的关系上。他说‘我们的手，是不同的，其大小影响字母的书写，因此写出的字反映着写字的人’。”

## 加尼·阿拉尼： 书法是人类与字母的 纽带

采访者：教科文组织巴桑·曼苏尔（Bassam Mansour）

“起源之时，就有巴格达，”加尼·阿拉尼（Ghani Alani）回忆着他的故乡在阿拉伯历史和伊斯兰书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说。巴格达是其它风格和不同流派的起点。但他也承认，书法艺术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其它闻名都城也得到了发展，从安达卢西亚到布哈拉都可以找到其发展的轨迹。

加尼·阿拉尼的书法。①

“我从哈希姆·巴格达迪那里学会了这种艺术，就像他从巴格达流派的创始人那里继承了这种艺术一样。有一天，他颁给我一份从未向其他学生颁发过的毕业证书。当书法大师颁发一份这样的证书，意味着他授予他的学生以自己的名义签署作品的权利。这一文凭是一种‘官方’文件，认可该学生已真正达到专家的地位。”文凭上写着：“当领取这一非凡证书的人显然已经深刻领会阿拉伯文书法的规则，并博采各流派众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授予他在其精美书法作品下方签名的权利……”

1967年，加尼·阿拉尼离开巴格达前往巴黎。“在巴黎，我攻读法律研究生课程，并获得博士学位，”他解释道。“开始我只想将书法作为一种爱好，但我对书法的激情占了上风。我这个律师脱下了律师袍，拿起削尖的芦苇笔作为职业工具。法学院院长在颁发文凭时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准备好了，可以从事法律研究了’。院长的意思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已经赋予了我们思考的方法。究其本质，这也

是哈希姆·巴格达迪大师在向我们传授书法时常说的。”

“完成法律学业后，我按照老师哈希姆·巴格达迪的愿望去了巴格达艺术学院，”他解释说。“我在学院的第一年，一位伟大的土耳其伊斯兰插图彩绘大师哈马德·阿米迪受邀前来讲学。他的教导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我现在既练习书法，又练习插图彩绘，这并不常见。”

“从一开始，我就努力去掌握阿拉伯文明中书法的精髓。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努力用书法来表达整体性与连续性。书法如一条江，融汇其它的艺术，就像大江不断有支流汇入。”

对于加尼·阿拉尼来说，阿拉伯文明中书法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是因为图画的表现形式被禁止。“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他坚决地认为。“伊斯兰文明中存在着绘画，尤其在土耳其和伊朗。此外，书法中包括了象形图像。阿拉伯文明出现书法的巅峰更多是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社会，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就已经是这样，那时诗歌是唯一的艺

术形式，诗人是其家族的骄傲。而哪里有语言，哪里就会诞生书法……”

加尼·阿拉尼还解释了书法的正式起源：“直线条与弯线条——自古以来，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带音符的表意文字，字迹里都发现这两种线条，带音符的表意字为楔形文字带来了音节结构。在出现楔形文字后，文字书写开始使用直线条与弯线条。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中可以找到一些实例，如汉谟拉比法典的铭文，其字母以笔直为特征，这与当时的习惯是截然相反的”。

加尼·阿拉尼还向我们讲述了他对库法体书法的观点。“我从来没有把库法体当作直线体。我觉得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直线体与角形体都是库法体。事实恰好相反。库法体的名字来源于库法城，但其起源却可追溯至库法城建成之前的‘悬诗’时代（‘悬诗’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出现的最优美的七首诗，铭刻在麦加天房神殿的入口处）。对于我来说，我更愿意将库法体看作是角形体。库法流派确实不断在改善，并且在手稿以及建筑领域都



© UNESCO/ Patrick Lagis

“阿拉伯文明是语言的文明”。①

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巴格达流派后来创造出了草书，包括几种类型，苏尔斯体、迪瓦尼体与娜斯奇体，其中娜斯奇体已经成为印刷体。”

虽然加尼·阿拉尼以“悬诗”为例，但人们怀疑这些著名的诗歌是否存在。“总会有人怀疑悬诗的真实性”，他解释道，“但是，毫无疑问，在伊斯兰时代来临前就已经存在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文字。我们在石板上发现了刻在上面的文件、条约、协议，这些史料都要追溯到伊斯兰时代前。我们也在一些考古地点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其中最著名的一处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马丹沙利（Mada'in Saleh）。（该遗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加尼·阿拉尼在巴黎已经生活了40多年。谈到他自己与西方的关系时，他吐露：“我生活在欧洲，我与西方社会的交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种交流是双向的，虽然阿拉伯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差别。前者以语言为基础，后者以图像为基础。但是，语言包含图像——最好的例子就是诗歌，古人称之为‘阿拉伯语体’”。

获得联合国沙迦阿拉伯文化奖对加尼·阿拉尼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这是对书法作为一种艺术的肯定，这种艺术是阿拉伯文明的一脉灵魂，是承托这种文化的骨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以伊拉克艺术家的身份获得该奖项的。这使我能够反映伊拉克的另一面，与充斥屏幕的战争与暴力场景不同的一面”。

加尼·阿拉尼和波兰出版商及学者安娜·帕兹米斯是2009年教科文组织沙迦阿拉伯文化奖得主。该奖项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倡议下于1998年创立。每年评选出为阿拉伯文化的发展和推广作出重要贡献的两位获奖人——其中一位来自阿拉伯国家，另一位来自其它国家。如想进一步了解该奖项，请联系：

[jtchilinguirian@unesco.org](mailto:jtchilinguirian@unesco.org)



萨姆·努乔马总统在教科文组织，2004年。

© UNESCO / Michel Ravassard

## 男女平等——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非洲备受尊崇的老政治家萨姆·努乔马，领导了纳米比亚共和国在1990年取得独立，并担任总统达15年之久。他促进男女平等的努力与其为自由而战的事迹相比知名度较低。在这次采访中，他向汉斯·德奥维尔和克莱尔·斯塔克解释了他怎样看待妇女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作用。

努乔马总统，您作为非洲国家独立斗争中的一位资深自由战士而知名。您也是一个男女平等的倡导者，我们想听听您就这个问题的见解。

男女平等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男女谨遵各自性别角色，但现在，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一切。现在女性从事以前男人才从事的很多工作，但（要达到男女平等）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需要更多技术熟练的男子和女子，去充分开发我国

的自然资源。很显然，要确保消除贫困，每个人都必须作出贡献。

在贵国的解放斗争中妇女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妇女在解放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有女兵营，她们往往比男兵更强硬。为了促进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我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党（人组党）决定，妇女应占人组党代表大会50%的席位。我们的秘书长是一位女士，彭杜克妮·伊武拉-伊塔娜。她同时也是司法部长。

## 纳米比亚政府的情况是否也如此？您是否也在努力促成女性担任50%的部长职位？

这在我们的计划中，但我们尚未达成这一目标。目前妇女在我国国民议会的人数占22%。我们必须履行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非共同体）、区域经济集团和非洲联盟的义务，其中规定，到2015年女性担任50%的政府职位。

## 您是否建议在国家预算里为男女平等事业留出额外资金用以促进女性参政？

我认为没有必要为政府雇用女性而增加国家预算，但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以确保人组党每个辖区的所有儿童，不论男女，都能接触到计算机，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技能，从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获得成功。

教育是发展的关键。刚独立时，一个人受到的教育质量高低是根据你的肤色和种族背景决定的，于是，白人当然就接受最好的教育。这种系统是种族隔离制度强加于社会的，因此独立后我们不得不推倒一切重来。现任总理纳哈斯·安古拉阁下，在1990年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时，是当时的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负责改革纳米比亚的教育体系，由于他的努力，现在我们纳米比亚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体系。

## 您认为纳米比亚现在进行的发展项目是否向女性足够开放？

在纳米比亚，我们鼓励女性参与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

## 就男女平等而论，您如何理解多边体系中的这一问题？您对目前的状况满意吗，或者说您认为目前的趋势应该继续吗？

在多边体系中，我冒昧地说，所有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中至少85%

应当由女性领导，因为她们更善于解决那些集中于推动以人为本的发展的问题。

汉斯·德奥维尔（Hans d'Orville）是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

克莱尔·斯塔克（Clare Stark）是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办公室的助理计划专家。

这一专栏由教科文组织的战略规划局发起，关注的问题面向未来，旨在向广大公众和会员国传播信息。该专栏展示教科文组织在其各专长领域所进行的反思、计划和行动，及因此引发的思想和意见。

联合国系统据领导岗位的女性人数最近有所增加。

10月，保加利亚的伊琳娜·博科娃当选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是陈冯富珍，世界人口基金署（WFP）总干事为苏拉亚奥贝德，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执行干事约塞特·施林，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总干事海伦·克拉克。

Oxapampa-Ashaninka-Yanesha，位于秘鲁亚马逊乔木地区，2010年6月被列为生物圈保护区。➔

2010年6月，13处新址加入生物圈保护区全球网。目前，该网拥有在109个国家的564个保护区。

生物圈保护区是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指定的区域，目的在于测试包括生物多样性和陆地资源、沿海资源、海洋资源、淡水资源在内的管理方法。众多经验被用于生物圈保护区，以便吸取教训，达到可持续发展。

阅读：

生物圈保护区全体名单（2010年）（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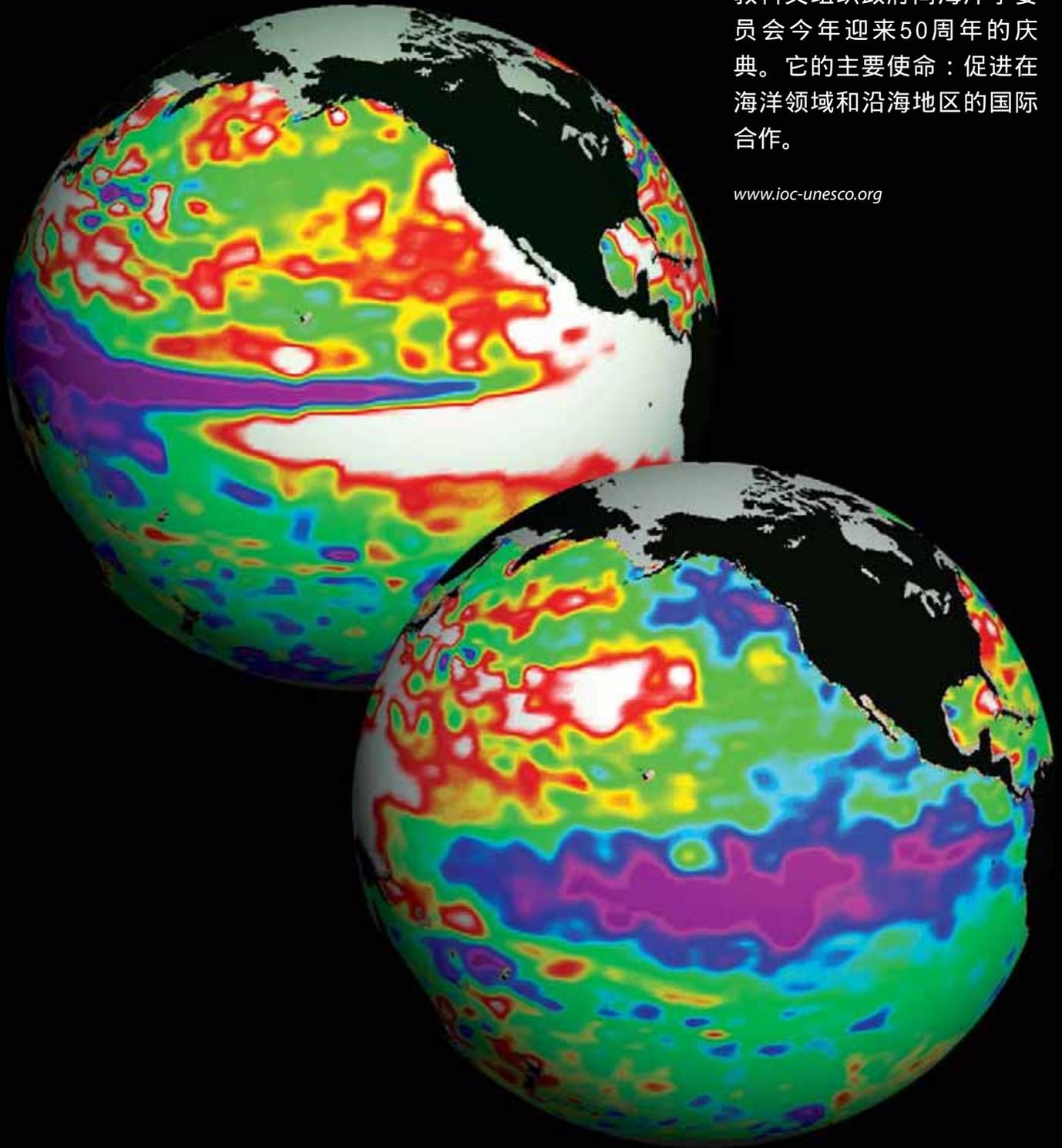
<http://www.unesco.org/mab/doc/brs/BRList2010.pdf>

出版物采用再生纸印制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今年迎来50周年的庆典。它的主要使命：促进在海洋领域和沿海地区的国际合作。

[www.ioc-unesco.org](http://www.ioc-unesco.org)



1997年11月的厄尔尼诺，和1999年3月的拉尼娜。这些太平洋的图片显示了海平面的变化，并帮助人们理解海洋和大气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是影响气候的因素。

© Nasa